

日丹諾夫等著

論  
布爾什維克的  
革命

遼東書局 印行



# 論布爾什維克的原始性

日丹諾夫

遼東書店發行

# 目 錄

- 一、與群眾連系是黨的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真理報專論
- 二、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上培養幹部……………葉 群譯
- 三、日丹諾夫同志在討論阿列克山得洛夫所著西方哲學史一書會議上的發言……………立 三譯
- 四、聯共中央書記日丹諾夫關於「星」及「列寧格勒」雜誌所犯錯誤的報告
- 五、論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斯列波夫作  
亞 天譯
- 六、論忠誠與老實……………斯列波夫作  
齊 生譯
- 七、論對缺點的不調和及布爾什維克的嚴肅性……………斯列波夫作  
蘇 英譯
- 八、對新事物的感覺是布爾什維克高貴的品質……………多爾庫諾夫

# 與群眾連系是黨的

## 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

——真理報專論——

布爾什維克黨的偉大創立者與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總極度重視黨與群眾的連系，總關心這種連系的擴大與鞏固。我們的黨是不能同人民分離的。黨是被許多堅固的不可破裂的鏈鎖同千百萬勞動者連系着，而它的力量，它的不可戰勝性就在這裡。斯大林同志說：「布爾什維克的所以強有力，就是因為他們與自己那生育、撫養和教育了他們的母親即群眾保持着連系。而只要他們同自己的母親即人民保持着連系，則他們就有一切可能依然是不可戰勝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之所以是不可戰勝的，其關鍵就在這裡。」

我們黨的全部歷史說明着布爾什維克是善於組織成百萬的群眾，善於團結群眾，與他們打成一片，並使他們跟隨自己。在祖國戰爭的日子裡，「黨同人民是更加親密了，同廣大的勞動群眾的連系是更加密切了。」（斯大林）

布爾什維克黨在人民群眾中間享有巨大的愛、無限的威信與信任，因為勞動人民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深信黨的政策之正確，深信布爾什維克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沒有其他的利益，除了為勞動人民的幸福而鬥爭的崇高目的以外，沒有其他的目的。在我們國內，兩種偉大的力量——人民與共產主義已合而為一。蘇維埃社會制度正把蘇維埃人民結合成一個總的集體，創造着一種黨與人民之間完全的相互信任與相互了解的氛圍。

黨會號召勞動者加速恢復與發展工業，於是工人階級就以提前完成工業計劃迎接偉大十月之三十週年的有力競賽來回答這個號召。黨會號召蘇維埃農民為最快的提高農業，為使國內糧食豐裕而鬥爭，於是集體農民對這一號召就回答以為高額收穫的群眾進軍。

激發群眾的這種勞動熱情，引導這種熱情去完成經濟與文化建設的具體任務——黨組織的主要責任就是如此。

領導的藝術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領導——這並不是說坐在辦公室裡寫作指示。領導——這是說推動廣大階層的人們，帶領他們去勝利地完成黨所規定的任務。同群眾，同人民的經常的連系，不僅善於教育群眾，而且善於向群眾學習——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基礎。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為了正確的領導，只是領導者們的一種經驗是不夠的，這種經驗是不充分的。為了正確的處理事情，領導者應該以群眾的經驗，以普通黨員的經驗，以勞動者的經驗來補足自己。

在一九三七年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二、三月全會上，斯大林同志曾舉例說明，中央委員會

如何珍貴普通人們的經驗，如何注意傾聽他們的建議。在提起全會參加者注意聯共（布）中央委員會與蘇聯人民委員會關於提高頓巴斯煤的產量決議後，斯大林同志說：「中央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的這個決議——它已爲我們全體同志所承認爲正確的而且甚至是著名的決議——是由下層的普通人們給我們提示的。」

黨的領導者——州委的、市委的、區委的、基層黨組織的書記——如果他願意實際地布爾什維克地指導事情，他就應該經常傾聽普通工作人員的意見，同他們拉話，考慮他們大量的實際經驗。

下述事實也說明這一點是有着如何決定性的重要。有一個普通黨員斯塔哈諾夫運動者馬特洛索夫，他是「巴黎公社」工廠的切皮工人，他曾提議製訂普及斯塔哈諾夫勞動的方法計劃，以便在一定時期內全體工人無例外地完成並超過生產定額。工廠的黨組織支持馬特洛索夫同志的創議。莫斯科黨委會通過了關於普及靴匠的經驗到其他工業部門的決議。於是一個在目前普遍全國的、爲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新的群眾運動開始了。

這就是爲什麼要傾聽普通工作人員的意見，隨時大力支持他們的主動創議的道理。

斯大林同志又教導說，組織決議的執行，乃是正確領導的最重要的條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沒有群眾的直接幫助是不可能的。組織決議的執行實際上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把決議的思想與意義變成勞動者的意識，推動他們去勝利地完成這個決議，保證一切政策中黨員的先鋒作用，發動群眾中的組織的與政治的工作，展開競賽與先進經驗的宣傳。沒有群眾的幫助，連組織

決議的檢查，同樣也是不可能的。

布爾什維克黨把自己對群眾的領導，建立在完全的相互信任與相互了解的基礎上，布爾什維主義與行政命令是水火不相容的。黨始終堅決地與黨員傲慢自大的各種表現，簡單的行政命令辦公室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作鬥爭。在這一點上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二月全會的決議是一個嚴重的警告。決議說：「不能容忍這樣的一些缺點如像：以行政命令、集體農場主席的經常更換，集體農場內部民主的破壞等，來代替集體農場中不屈不撓的系統的組織工作和幹部教育。」全會要求黨的一切組織更加鞏固同群眾的連系。

遺憾的是，我們還有這樣的一些領導者，他們藉自己的職位作威作福，高傲自大，脫離群眾，不傾聽普通黨員、工人、集體農民的意見。當然，在這些領導者那裡，事情是不能推向前進的。

什科達同志担任着奧木斯克州卡拉泰斯克區的黨委書記。他一直迷戀於行政命令，以致他不僅脫離了非黨的積極分子，而且也脫離了共產黨員。什科達同志來到集體農場，來到機器拖拉機站——他不去同領導者們，同普通的工作人員談論，不傾聽他們的意見。他大吵大鬧，而不管事情真相怎樣，他又到別處去了。這種方法能達到什麼結果，是不難想像的。結果是不僅普通黨員們，就是黨組織的書記，都極力避免到區委書記那裡去。區內黨的政治工作是異常的薄弱，該區的經濟工作在州內也是最落後的。布爾什維主義的領導者，應該同群眾有經常的交往與接觸，在其一切活動中憑藉他們。然而布爾什維克同群眾的接觸從來不能意味着尾巴主義。相反，尾巴主義，同行政命令一樣，與布爾什維主義的精神與政策毫不相干。



有時會有這樣的事：黨組織的領導者表面上似乎同群眾是有連系的，他常在工人與集體農民中間。可當你往深處看——就發現這位黨的領導者並不在探究事情的實際，他在同人們的談話中逃避談論尖銳的問題。

當然，布爾什維克不需要這樣的「連系」。真正的領導者並不做群眾的尾巴，而是領導他們跟着自己。他首先忠實於同群眾的關係。他不害怕尖銳地提出問題，只要這問題照黨的觀點是正確的。如果工人或者集體農民工作很壞，沒有完成規畫，領導者的責任就在於改正他，率直地同他談話，而如果需要時——就由大家來批評他。這只會帶來益處。領導者的壞的工作，被領導者的壞的工作，都需要批評。

黨將其同人民連系，建立在以列寧、斯大林的偉大思想的精神深刻教育群眾的基礎上。說服的方法，是黨的政治工作中基本的與主要的方法。這就是黨之所以要責成每個黨員進行鼓動與宣傳，向群眾解釋黨的政策與決定之意義。領導者必須以身作則。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全會指示，「區的、州的、邊疆的和共和國的黨與蘇維埃的機關負責領導的工作人員，必須到集體農場中去，親自指導政治的與黨組織的工作，指導集體農場的座談會與會議，在黨的基層組織中解決黨的與政治的工作。」

可是，並不是各地都在執行這個極端重要的指示。在布利安斯克州，許多黨的與蘇維埃的工作人員逃避做集體農場的政治工作。他們中有些人還算是講黨團中的人，可是，他們就連自己這個責任也不去盡，州蘇維埃執委會副主席格列賓尼可夫同志終年不在集體農場作一次報告。

四月和五月間他是在齊里亞廷斯克與維葛尼奇斯克區，但是他沒有一次向集體農民講話。他說：「沒有時間作報告，應該播種了。」

黨的蘇維埃的工作人員，應該利用一切同勞動者連系的形式。在這裡親自與人們接觸，是有巨大的意義的。這種接觸常能很好地使人說出心裡話，無畏地確定群眾的情緒，立即解答群眾的詢問，並在政治上教育他。那些極力鞏固勞動者的有官僚習氣的領導者，是值得最尖銳的譴責的。而另一些工場的管理人或蘇維埃組織的領導者，普通的人簡直難以會見他們。不能容忍類似的這類非布爾什維克的實際。

黨的組織，應該儘可能地好好利用群眾組織的機關——勞動者代表蘇維埃、職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等等，以鞏固向群眾的連系，以改善對他們的領導。企圖僅僅依靠組織的力量，黨員的力量來做一切，而不吸引非黨的積極分子參加工作的那種黨的領導者，是不好的，布爾什維克領導的藝術在於在勞動者的一切群眾組織的活動中，組織配合行動與連系，領導他們，去完成這些或那些任務。

黨的組織應該經常關心改善地方蘇維埃的、職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工作，必須用一切方法鞏固它們，以對選民、對人民、對廣大勞動群眾負責的精神教育它們的工作人員。

同群眾連系的最重要的工具是報紙。它使黨能夠每日每時地去同群眾談話，把黨的思想與政策變為成百萬群眾的財產。黨的與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之責任，就是積極地參加報紙工作。可惜很多地方工作人員很少這樣做。

同人民密切的經常的連系，善於不僅教育群眾，而且向群眾學習，善於領導群眾並傾聽他們的意見——黨的領導者之最重要的品質，就是如此，正確的布爾什維克之領導的條件，就是如此。每一個黨組織的，黨委員會的領導者，每一個黨員，都應該嚴格地遵守這個列寧、斯大林的指示，做群眾的真正領袖。我們一切勝利的基礎，就在這裡。

(A·葛萊普涅夫作，齊生譯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真理報)

# 在批評和自我批評 的精神上培養幹部

葉

群譯

在全國範圍開展着的爲提早完成五年計劃而進行的鬥爭，指示出我們有着加速運動向前發展的極大可能。這件事情的許多方面首先依賴於我們全部工作的質量，以及我們善於克服前進路上的困難和改正缺點。

自然，在我們爲了加速前進到共產主義的鬥爭裡，批評和自我批評有着特殊的地位。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在我國範圍永遠地結束了社會發展的盲目和自發的規律；能越快、越充分地掃除我們前進路上的障礙和缺點，越積極的扶植向前發展着的新的事物的萌芽，那麼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就會更加順利。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批評及自我批評是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是運動前進的規律。

我們的國家是由一個黨領導着的，這是共產主義者的黨，正因如此斯大林同志教育我們：

如果我們想要前進，我們應當揭發和改正自己的錯誤，難到還不明白？任何另外的人不能比自己更能揭發和改進自己，難道還不明白？同志們，自我批評是推動我們向前發展的一種重要力量。由此，斯大林同志要求領導幹部每天總結自己的工作，要求他們更經常地更嚴肅地檢查自己活動的效果。不害怕檢討自己，勇敢地批評自己的缺點。要在下列條件下進行自我批評——首先善於誠實地揭發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研究實際經驗，科學地把這些經驗普遍化，並把這些經驗運用到領導上去。

在我們這裡廣泛地發揚民主，就造成了及時揭發迅速糾正我們實際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之極大可能。一方面只是由領導人去發現缺點，自然，他的這種觀察因從上面來看問題是有局限性的；當著我們吸收與改進工作血肉相關的，能以其本身經驗來豐富領導人的經驗的廣大群眾參加到發現和改正缺點的工作中去的時候，又是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不善於利用被領導者經驗的人，如果一個對批評、自我批評及其他發表意見的講台不感興趣的人（這種講台例如我們的討論會，大會，擴大會，臨時代表大會，報紙等等正是能够使我們完全行動起來的，能幫助我們掃除缺點的），在蘇聯的條件下，他們是不配成爲一個領導者的。

黨應堅持教育幹部，使他們對展開批評有真心真意的關心，教育他們怎樣去開展批評及自我批評，自己應怎樣以批判的精神去對待自己的工作。在這方面黨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經濟文化建設各部門中有着很大數量的這樣的工作人員，他們善於使用自我批評的武器，能敏銳地對待來自下層的建議，積極地掃除缺點。有着真正布爾什維克對待批評及自我批評模範態度的黨的

工作幹部，是應該具有上述特點的。

可是不能忘記，我們正是在新的與舊的、與妨礙蘇聯人民生長和完善的舊社會殘餘作鬥爭中來用布爾什維克品質進行對我們人民的教育的。舊的資產階級留給我們的遺產之一是對待批評的看法，認為批評對於被批評的人來說，是對他們的一種威信與名譽的破壞。資產階級建築心欺騙和強迫之上的。他們害怕光明和批評，他們處心積慮把自己的瘡痕隱藏起來，用天下太平的幌子來把他們掩飾起來。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資產階級的老爹們『對自己所有的缺點容許若干程度嚴肅地自我批評，和若干程度的自由批評，那麼資產階級制度就會分崩瓦解，不復存在了。』資產主義社會進行着殘酷地、分裂人類的、培養個人主義的競爭規律，使人與人間互不信任。社會主義結束了這種分裂人類慫恿互相撕殺的制度，把批評變成以改善工作爲目的，同志間互相幫助的偉大辦法。在我們的條件下，任何一個工作者的批評其目的都在於幫助他改正自己的缺點。批評，這是全社會對於每一個人的關心的表現，希望每一個人的工作都帶來極大的益處。因爲我們所有的勞動已不復是私人的事，它已有其直接的社會性質。

如果說在我們的條件下不去關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那麼去談真正關心工作的改善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對待批評的態度可以成爲標示工作幹部的社會主義覺悟水準和能否把社會利益放在個人自尊心之上的尺度。當然，因爲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針對着具體工作人員所犯的缺點和錯誤的，就不能不引起各種個人感情上的難過。一個人如果在接受批評時不致有很多痛苦，只有放下感到自己優點很多的包袱。只有被個人主義殘餘的大包袱壓得疲憊不堪和沒有經受過蘇維埃社會教

育的實際考驗的人，才有着氣憤和病態的自尊心，這種氣憤和自尊常常能够蒙蔽他們認識對改正缺點起積極作用的批評之本質。對於這樣的人，我們可以說他還不够做一個真正的領導者。斯大林同志說過，領導者不能忘記個人的自尊心，自己的感情置於事業的利益之上，他就不是好的領導者。據說，有爲了報紙上的批評而追究記者的事實，斯大林同志把這些事實稱之爲：『資產階級道德的殘餘。』

可惜，我們這裡還存在着這種對待批評的態度。這種態度是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批評作用根本相矛盾的。這種態度有時甚至存在於黨內生活裡。不久以前聯共黨中央因爲別基格爾斯科市黨的組織壓迫批評而通過了決議。聯共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在討論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關於市委書記撤職的決議時，有幾個同志在發言中表示了對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的一些批評和指責，根據這點就把他們在市委常會的發言判爲組織反黨集團的罪過，並向他們追究對黨的責任。市委工作人員要求批評特委的共產黨員做聲明，以便將來在批評中爲自己辯護，組織了對會議上發言黨員『品質』的審查工作，並竟然給以嚴重的黨的處分和撤去工作職務。

聯共黨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忽視了別基格爾斯科黨組織壓迫批評的事實，並且沒有改正市委所犯的錯誤；此外還有特委第二書記巴希金同志參加了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他不僅不能指正市委所犯的錯誤，並且在城市的積極分子會議上，發言追究批評特委委員的黨員，要他們對自己的發言負責。

聯共中央責成聯共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重新審查關於向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發言黨員

追究責任的錯誤材料，並向聯共特委第二書記巴希金同志指明，他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的積極分子會議上自己的錯誤發言，幫助了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的組織對批評的壓迫。

別基格爾斯科市所發生的事情証明了，還有個別黨的幹部不理會這個起碼的常識：就是如果對批評斤斤相加，就不可能有積極的黨的生活和幹部的生長。誰要是企圖以愚蠢的官僚管理的辦法和處罰來對待批評，那就很快的暴露了自己是不善於領導的人，不能夠依靠黨的群眾的積極性和不能夠回答群眾對領導幹部的要求的人。

不然，像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組織存在過的，對批評阻礙的同樣事實不是很有有的，並且這些事實也不難於發現。當批評被忽視或以廣泛地開展批評來做掩護，而實際上却是絞殺任何關心真正揭發缺點和錯誤的時候，那麼問題就複雜得多了。還有一些工作幹部，他們決心做好一切，以便做出他們最注意傾聽意見和批評的樣子，這樣的工作幹部常常並不阻礙別人的意見，有的爲了諱衆取寵，表面上把別人所提出的批評指責都記在日記本上，甚至對批評表示萬分感謝，誓言改正缺點，但是要和他的反省變爲實際的事他却一點也沒有做。如此把反省變爲空談的態度是最厲害的絞殺批評的態度。

幾個月前，中央機關和政府各部黨的組織開過了會議，在會議上對於機關工作缺點和個別工作人員的錯誤進行了嚴重的批評。會議上提出的很多問題要求補充研究檢討和採取今後辦法。會議上提出了不少關於改良工作的意見，但是實際上會後在個別政府部門中沒有做出任何實際的結論。這些機關的黨委組織忽視共產黨員所做的批評。這樣的對待批評的態度給予黨的損失，並不



亞於粗暴的壓迫批評的態度，對批評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態度，不僅僅在於注意傾聽批評，而首先在於用怎樣的積極性去實現批評。的確，領導者習慣於忽視批評，並看到別人對自己並無責備，他就麻痺了自己在黨面前的責任，同時這種忽視批評降低了黨組織的積極作用，減低了改正缺點的責任，使得有的人看見他自己的批評毫無作用，就或是全不發言，或是開始不認真去發言，因為他覺得無論你怎樣說反正人家也不會注意。

這種不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態度不外就是幽棲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各種形態的官僚主義和在我們黨組織中存在着毛病。斯大林同志說：『官僚主義的危險首先具體表現在束縛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獨立性，它使我們隊伍裡潛藏着的大批後備力量不能發揮出來。』自我批評就是這樣一種動力，它能幫助我們啓發群眾的主動性，幫助充分利用蘇維埃制度的可能性，並能堅決揭發各種形式的忽視自我批評的現象所直接帶給我們事業上的損失。

黨要使領導幹部每天都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中受到教育，而這種教育只有在發揚黨內民主的情形下才能獲得成績。自我批評與黨內民主是不可分離的。黨的實際活動，創造了集體工作的許許多多的方式，這些方式保證了有效的批評和改正缺點，保證了廣大的黨的群眾不僅僅積極參加決定問題，而且積極參加了領導黨的生活的各個方面。黨的委員會、代表大會、積極分子會，如同聯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到三月決議上所說的一樣，是：『開展對我們工作的缺點批評，和黨的領導者自我批評最好的舞台之一。』黨的機關最重要的任務——不僅僅要保證經常召集黨的各種會議，而且是逐漸的提高討論問題的水平，堅決地消滅討論問題中的鋪張、八股、老一

套的因素。妨礙真正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嚴重缺點，就是我們常把論議上應有的爭論變成彙報會的性質，發言的目的不是幫助正確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和解剖缺點，而是報告他所做的工作，引証出很多統計材料和數目字，以便製造一幅或大或小的百事如意的圖畫。這種報告在發言中給人的印象是：經濟工作者的發言是經濟問題，黨的工作者的發言是黨的問題。缺乏批評，沒有利用各個工作部門積累的經驗，也沒有使這個經驗反映到事業中去。

領導者應當領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討論中，是否避免尖銳的提問題，是否遷就了個別人的自尊心，是把批評僅僅針對着普通的工作人員，還是不顧慮工作地位以揭發缺點的真正原因爲目的，這些問題如何提法都首先是看領導者的態度。批評不是簡單承認工作中的各種過失和錯誤，批評應是以發現錯誤的本質，揭發其根源，以便策劃改良事業的方法爲目的。這就要求較大的領導幹部，善於深刻的分析現象，善於分清主要的和次要的，善於從現象中找出本質來。領導者應當能於傾聽所有的寶貴的批評和指責，即使這些批評和指責初看起來似乎是並不重要的，他同時應當善於解釋這種或那種批評中的錯誤性，對不正確的，尾巴主義的，奉承阿諛的發言，不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我們需要的不是所有其它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所需要的是，改善領導，鞏固紀律，提高共產黨員的積極性和責任感的批評。黨的領導幹部政治上的成熟性，思想水平，和原則性就是在是否善於組織這種批評的問題上可以檢查出來。

如果批評和自我批評成爲日常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一個時期一個時期來進行的，那麼幫助改善工作的批評意義以及教育作用才會充分體現出來。通常發揚批評僅僅是在工作有了嚴重的損失

時候。可惜得很，當着錯誤還在胚胎中的時候，還在僅僅揭發壞根就可以結束它的時候，我們却很少展開批評和揭發錯誤。由於我們揭發缺點的不及時，我們已遭受了很大的損失。雖然有些並不需要費大的力量就可以迅速糾正的事，我們却常是忽略這個萌芽，而認爲它是不重要的。可是工作人員的毛病隨着時間發展起來，以至於不得不採取嚴重的辦法，甚至發展至撤職等等。各種工作的缺陷任何時候不是突然發生的，經常都在逐漸發展着。領導者如果認爲是突然發生的，那僅僅是由於領導者自己對工作沒有批評的態度，忽視了預告的信號。事實說明了，有時不得不撤換幹部的事，譬如說如果一個區委書記，要是很久以前已對他有過批評和指責，已及時注意幫助了他，那麼事情就不會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我們也能够挽救這個幹部。常有這樣的事，批評僅僅是針對着名聲不好的工作人員，而把公認爲好的置諸批評圈外停止了指明缺點，沒有分寸的恭維他。這種辦法是會害了一個有出息的工作人員的辦法。

布爾什維克黨是以他的不抹煞工作幹部的缺點和錯誤，堅決澈底地揭發他們，幫助他們糾正，來保證對幹部的教育和培養的。是以幹部自己的錯誤來教育幹部的。黨僅僅是以事業的利益來做爲他行動的方針，他照顧的僅僅是事業的利益，而照顧的不是幹部的自尊心和情緒。我們要求各經濟思想部門中的幹部，對待批評要有原則要客觀。

一切片面性，都會給我們事業帶來損失，這是個很大的教訓。在評價法捷耶夫著名小說『青年近衛軍』之文藝批評的錯誤問題上就是 例。大家都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去分析了這本小說的可抹煞的優點，忽略了對這本小說的嚴重的缺點的批評。爲了文學進一步的發展及作家本身的提高

，應當指出在這本小說中沒有表示出黨的領導作用，和把布爾什維克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加以歪曲，以及犯了其他帶有原則性的錯誤。

當着我們對生活中的各種現象，還沒有客觀的檢查時，或是全盤的吹噓恭維，或是全盤的非議，就會妨礙實際糾正缺點，和遲滯了幹部的發展。此外，這種態度對那些政治上不成熟而有了一點點成就的人，最容易使他們發生昂首天外，自高自滿，百事大吉的態度。大家都知道，例如黨的組織在執行聯共中央二月會議的決議時，做了很多工作，在戰後恢復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上得到了重大的成績，當然，這決不是說所有的農村黨的工作缺點已經克服了。爲了真正的提高領導集體農莊的水平，爲了在普及過去一年經驗的基礎上澈底揭發過去所有的缺點和漏洞，還有很多的事要繼續去做。可是有些黨的工作者，在改進自己的工作第一步以後，就把批評置諸腦後，而代之以鋪張、讚誦，通常隨之而來的是高枕無憂和天下太平的觀念。

在本雜誌上已公佈過莫爾多夫黨組織的錯誤。他們把總結一年農村經濟的省委擴大會，稱之爲「勝利者的大會」，因此就把問題的討論變成某種互相發表吹噓恭維的檢閱。比這更不體面的事是聯共黨客巴爾金斯科省委書記完成了徵糧工作以後，所收到的雪片飛來的賀電和祝辭，以及他本人對區委和集體農莊的謝電，登滿了地方報紙的篇幅。

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任何時候也不會高枕無憂於自己既得的成績之上。他們很好的記住斯大林同志所說的話：滿足於自己的勝利，『就是我們運動前進的終點，爲了使這種情形不致發生，我們需要自我批評。』我們的成功越大，我們所創造的勝利前提就越高，那麼就要更高的要

求我們的幹部。勝利和成功不僅不能赦免我們的缺點，相反地，應當更堅決地幫助揭發缺點。只有這種態度，能够保證我們的經濟文化建設在各部門中不斷的前進。

擺在我們國家面前的任務，要求提高領導幹部的水準，加強批評和自我批評。如果對那些妨礙掘發我們可能性和後備力量的事情不展開批評，那麼就不能加速經濟的發展；不在思想戰線上開展原則的客觀的批評，就不能克服在蘇維埃人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只有勇敢的自我批評能够使幹部提高，能够勝利地解決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黨的組織的重大責任，就是不斷地在自我批評精神中培養幹部。

(譯自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黨的生活二十三期社論)

# 日丹諾夫同志在討論阿列克山得洛夫

## 所著西方哲學史一書會議上的發言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日—— 立 二三譯

同志們！關於阿列克山得洛夫一書的討論，沒有局限於這個題目的範圍，而開展得更廣泛和更深入，提出了哲學戰線狀況中的一般問題。這次討論變成了一種關於科學的哲學工作狀況中各種問題的全蘇聯討論會議，當然這是完全自然而合理的。編輯哲學史教科書，編輯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教科書，是一個有重大科學意義和政治意義的任務。所以中央委員會組織這一次討論，特別注意這個問題，決不是偶然的事。

編輯一部好的哲學史教科書，這就是給我們的知識分子，我們的幹部，我們的青年一種新的強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時也就是在發展馬克思、列寧哲學的道路上前進一大步。因此，在這次會議上對於這部教科書提出了這樣高的要求，是當然的事。因此擴大討論的範圍，只是有益處的。討論的結果，無疑地會是很巨大的，尤其是因為在討論中不僅涉及了那些與估計這本教科書有關

的問題，而且涉及了哲學工作中許多更廣泛的問題。

在我的發言中想把這兩方面的問題都說一說，我決不是想來做討論的總結，——因為這是這本著作者的任務，——我只是參加討論發言而已。

我要預先請大家原諒，在我的發言中將要作些引証，雖然巴斯金同志極力反對我們這樣做，當然，他是哲學大海中的老航海家，可以憑眼光，憑想像，在哲學的巨洋中駛來駛去，用不着羅盤針的（笑聲）。可是我只是一個在哲學海洋中航行的見習生，初次坐在顛簸搖擺的船上，遇到這樣大的哲學風浪，只好拿引証來做羅盤針以免迷失方向（笑聲、鼓掌）。

現在說到對於這本教科書的意見。

## （一）阿列克山得洛夫所著教科書中的缺點

我想，我們對於哲學史教科書有權要求它遵守下列條件，這些條件在我看來是起碼的條件。

第一、哲學史教科書需要對於哲學史這門科學下一個確切的定義。

第二、哲學史教科書必需是合乎科學的，也就是說要以現時所達到了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底成就為基礎。

第三、哲學史的敘述應當是創造性的，而不應是繁瑣哲學式的，必須與現時任務直接聯繫，以便說明這些任務，並指出哲學繼續發展的前途。

第四、引用的實際材料應當是經過審查完全可靠的。

第五、敘述的文字，應當是明確易懂，使人信服的。

我覺得阿列克山得洛夫的這本教科書是沒有滿足這些要求的。

首先說到關於這門科學研究的對象。

賡溫科同志指出過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寫的教科書沒有給人們關於這門科學研究對象的明確概念，雖然在書中寫了許許多多定義，可是都只有局部的意義，其中沒有一個完整的可以概括一切的定義，因為每個局部的定義都只說明問題的某些方面。這個批評是完全正確的。哲學史之爲科學的定義，是始終沒有闡明的。在該書第十四頁上的定義是不完全的。在該書第二十二頁上說：『哲學史就是人類對於周圍宇宙的知識之前進、上升、發展的歷史。』根據作者這個定義，那就是說，哲學史研究的對象，是與一般科學史相符合的，而哲學本身就好像是科學的科學。這種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老早已經駁斥了的。

作者又說，哲學史也就是說明許多現代思想發生和發展的歷史，這也是不正確的，不確切的。因爲在這裡是把『現代』這一名詞的概念與『科學』這一名詞的概念看成是同一意義的東西，這當然是錯誤的。在下哲學史定義時，必須從馬恩列斯所下的哲學之爲科學的定義出發。

『……黑格爾哲學底這一革命的方面是馬克思接受和發展了的，辯證唯物主義，不需要人們把它叫做什麼站在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以前哲學所剩下的只有『關於思惟及其規律的學說，即形式邏輯和辯証法了。辯証法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也是一樣）是包括現在所謂認識論的。認



識論底內容同樣應當是歷史性的，就是研究和總結認識底起源與發展，研究從不知到認識的過渡」（見列寧全集十八卷，第十一頁）。

因此科學的哲學史是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及其規律底胚胎，發生與發展的歷史。唯物主義既然是與唯心主義派別鬥爭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那麼哲學史也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

從利用現代已經達到的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底成就的觀點來觀察這本書的科學性，那麼這本教科書也是犯了許多非常嚴重錯誤的。

作者把哲學史，以及哲學思想和哲學體系發展過程描寫成爲由於數量變遷增長而發展的平台進化過程，這就使人們想像以爲馬克思主義是從前進步學說發展的簡單繼承人，首先是法國唯物主義，英國政治經濟學，以及黑格爾唯心主義學派發展的簡單繼承人。

作者在四百七十五頁上說，馬恩以前的哲學理論雖然有時也包含有偉大的發現，但總不是貫徹到底和在一切結論上都合乎科學的。這樣的定義把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體系的不同點看作只是馬克思主義在一切結論上貫徹到底的和合乎科學的。那麼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不同點只在於這些哲學是不貫徹到底和不合乎科學的，那麼舊哲學家只是「犯了錯誤」而已。

你們看，這就只是數量的變化了。這就是形而上學的想法。馬克思主義底產生是哲學中的真正的發現，真正的革命。當然這也與一切其他的發現，一切其他的突變，漸變的中繼，一切其他

的到新形態的過渡一樣，不能不有預先的數變的積累，在這裡就是說不能不有馬恩偉大發現以前的哲學發展的總結。顯然作者不懂得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新的哲學，在質量上與所有以前的包括進步哲學體系在內的一切哲學體系不同的哲學。關於馬克思哲學對以前哲學的態度，以及馬克思主義在哲學中所作的革命，把哲學變成科學，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特別令人奇怪的是作者不集中注意去說明在馬克思主義中與以前的哲學體系比較起來，那些是新的和革命的東西，却注意到把馬克思主義與以前的哲學發展連接起來。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就說過，他們的發現就是舊哲學的終結。

「黑格爾體系想像它自己是一種站在其他一切科學之上的特殊科學，它就是最後的最完成的哲學形態。黑格爾哲學體系的破產，就成了整個哲學的破產。剩下的只有辯証的思惟方法以及把整個自然世界，歷史世界和精神世界當作是永恆運動，永恆變化，經常處在發生和消滅過程中的那種了解。現在不僅在哲學面前而且在一切科學面前都提出了一種要求，就是要去發現每個部門中這種<sup>科學</sup>革底永恆過程底規律。這也就是黑格爾哲學留給它的繼承人的遺產」（見恩格斯『反杜林』一九四五年版，第廿三至廿四頁）。

顯然作者不了解哲學發展具體的歷史過程。這本書最重要的缺點之一，如果不是最主要缺點的話，就是忽略了以下的事實：在歷史過程中，不僅對於某些哲學問題的觀點起了變化，而且問題的範圍，整個哲學研究對象都在經常變化着，這是與人類認識之辯証本質完全符合的，而且應當是每個真正懂得辯証法的人都明白的。

在該書第廿四頁中論到古代希臘哲學時，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說：『哲學之成爲獨立的知識部門發生在古代希臘奴隸社會時代。』又說：『哲學之成爲知識的特殊部門發生在紀元前六世紀時，並已有了廣泛的傳播。』可是我們要問，可否說古代希臘人底哲學是已經分化出來了的特殊知識部門呢？當然不能這樣說。古代希臘人底哲學觀點是與自然科學觀點，政治觀點密切糾纏的。所以我們不應當，而且沒有權把後來發生的科學分化和分類加到希臘時代的科學身上去。按實質說，希臘人只知道一種沒有分化的科學，其中也包括哲學概念在內。例如，德漢克里特，愛皮庫爾，亞里斯多德，所有這些哲學家，都証實了恩格斯的話：『古代希臘哲學家同時都是自然科學家』（見恩格斯所著『自然界辯証法』一書，刊載在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四百九十八頁）。

哲學發展的特點就在於隨着人類對於自然界和社會的科會知識的發展，從哲學中逐漸分化出各種積極科學，因此，由於各種積極科學底發展，哲學的範圍不斷的縮小了（順便說一句，這個過程直到現在還沒有完結）。這種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從哲學權力束縛下解放出來的過程，無論對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或對於哲學本身都是一種進步過程。

過去妄想認識最終絕對真理的哲學體系底創造者是不能幫助自然科學發展的，因爲他們把自然科學束縛在他自己的公式中，力圖站在科學上面，把不是從實際生活中得出的，而是從他的體系需要中得出的結論，勉強加到活的人類認識上去。在這些條件下就將哲學變成了一種博物館，把各種不同的事實，結論，假設，甚至幻想都堆在裏面。那時哲學只多只能成爲幫助人們觀察事物的工具，決不能成爲實踐上影響世界的工具，也決不能成爲認識世界的工具。

這種哲學的最後一個體系就是黑格爾體系，他企圖建立一座壓在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宮殿，把各種科學削足適履地局限於他所規定的範疇之中，於是他指望解決所有一切矛盾，却陷在與辯証法矛盾的沒有出路的狀態中。這種辯証法是他猜想到了的，可是沒有了解的，因此也就是運用不正確的。

恩格斯說：『既然我們懂得，要求哲學解決所有一切矛盾就無異是要求一個哲學家做到全人類在其前進發展中才能做到的事情，既然我們懂得了這一點，那麼舊意義的哲學就終結了。我們就要拋棄用這種方法所不能達到的東西，就要拋棄個別人所想像的「絕對真理」，而去力求按照各種科學所指示的道路，並用辯証法把各種科學底成果綜合起來，以求得所能達到的成就，即我們所說的相對真理』（見恩格斯著『費爾巴赫論』，刊載在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六百四十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底發現就是舊哲學的終結，即妄想包羅萬象地解釋世界的那種哲學的終結。

本書作者着重於說明馬克思與以前哲學家的聯繫而不闡明從馬克思起開始了哲學歷史上一個完全新的時期及第一次使哲學成爲科學的事實，這種模糊不清的說法，就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天才的哲學發現之偉大革命意義完全抹煞了。

與這種錯誤觀點密切關聯的還有以下的錯誤，就是在這本書中鼓吹一種對哲學史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把哲學底歷史當作是各種哲學派別的逐漸更替。其實從馬克思主義成爲無產階級底

科學世界觀的時候起，哲學史的舊時期就終結了。在那個舊時期哲學只是個別人們的事情，只是少數哲學家及其門徒所組成的哲學學派專有的財產，這般人都是脫離實際生活，脫離人民，與人民毫不相干的。

馬克思主義不是這樣的哲學派別，相反的，他是征服這種舊哲學，征服這種成爲少數特殊人物，貴族知識分子所專有的哲學，而產生的。它是哲學史上完全新時代的開始，從此以後，哲學成了無產階級群眾爲擺脫資本主義壓迫而鬥爭的科學武器。

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以前的哲學系統不同，它不是站在其他科學之上的科學，而是一種科學研究的工具，而是一種貫串一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同時這種方法又以這些科學在其發展過程中所得的成就，而更加豐富起來。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對所有以前一切哲學最完滿而堅決的否定。但正如恩格斯所說，否定並不是簡單說個『不』字，否定的本身包括有繼承性，就是吸收人類思想歷史上已達到的所有一切前進的和進步的東西，加以批判的改造，並統一爲新的更高的綜合。

因此，既然有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存在，在哲學史中就應當包括辯證法產生的歷史，表明辯證法產生的條件是什麼。在阿列克山得洛夫的書中沒有說明邏輯學和辯證法的歷史，沒有闡明邏輯範疇是人類實踐反映的發展過程，雖然在本書導言中引用了列寧的話，說每一個辯證邏輯範疇都應當看作是人類思想歷史上的交叉點，實際上他把這句話懸在空中了。

在這本教科書中把哲學史僅僅敘述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時止，卽是到一八四八年止，這是

毫無理由的。不敘述最近一百年的哲學歷史的教科書，當然不能算作教科書，爲什麼作者這樣無情地割棄了這個時期，是令人無從了解的。無論在序言中或導言中都沒有加以解釋。

在本書中沒有包括俄國哲學發展史，也是沒有說明絲毫理由的，無須證明，這種忽略是有原則意義的。不管作者根據何種理由，把俄國哲學史從一般的哲學史中勾去，抹煞不說，客觀上總是降低俄國哲學底作用。並且人爲地把哲學史分成西歐哲學史和俄國哲學史，同時作者又沒有作絲毫解釋，說明這種劃分的必要。這樣就是肯定了資產階級把文化劃分爲「西歐」文化和「東方」文化的觀點，這樣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西歐」的地方性的思潮。況且在導言第六頁上作者會極力證明一個相反的論據，堅決主張「不仔細研究和不利用以前俄國著名哲學家對於過去哲學體系的深刻批評就不能得到關於西歐各國哲學思想發展過程的科學概念」。那麼，爲什麼作者在自己的教科書中不實現這個正確的論據呢？這是完全不可了解的，這與作者任意把哲學史僅僅敘述到一八四八年止這件事同樣給予人們一種惡劣的印象。

以前發言的同志指出在這本書中沒有闡明東方哲學史的這個缺點，也是很正確的。顯然，就是根據這個原因，這本教科書也需要根本改造的。

有些同志指出說：教科書的導言顯然是作者的「信條」，作者正確規定了研究哲學史的任務和方法，可是作者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我想，這種批評是不夠的，因爲導言本身就是不正確的，經不住批評的。我已經說過，對於哲學史定義下得不正確和不確切。但不僅如此，在導言中還有其他理論上的錯誤，已經有同志說過，在闡明馬列主義哲學史基礎時引用車爾尼舍夫斯基，杜

勒洛留波夫，及羅曼洛索夫的話是很勉強的，因為他們是與本題沒有直接關係的。但問題還不僅在這裏，書中所引用的這些俄國大學者和哲學家們的話顯然是不適當的，其中所包含的理論原則，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是不正確的，我敢說，甚至是有害的。但我絲毫也不想損害這些學者的威望，因為這些引文採用的不適當，並且這些引文的本來動機是與作者所打算的毫不相同。因為作者引用車爾尼舍夫斯基的話是爲了證明各種哲學體系，甚至互相對立的哲學體系底創造者應當互相忍讓。

作者引用的車爾尼舍夫斯基的話如下：「從事科學工作的後起者總是反對他們的前輩，這些前輩底著作本是他們自己著作的出發點。例如，亞里斯多德敵視柏拉圖，蘇格拉底極端鄙視他所繼承的詭辯論者。在近代也可找到不少這樣的例証。可是也有一些可喜的例子，某種新體系底創造者明白了解他的意見是與他們的先輩的思想有聯繫的，而很謙虛地把自己稱爲這些先輩的學生，當其發現這些先輩見解中的缺點時，他們同時還明白指出這些見解對於他們自己思想的發展有多麼大的幫助。例如，斯賓諾塞對於笛卡兒就是如此。我可以說，現代科學底創造人總是對於他們的先輩表示敬意和愛戴，完全承認他們天才的偉大，以及他們學說的高尚品質（在這些學說中表現了現代科學創造者底觀點的胚胎），這是很光榮的事」（見阿列克山得洛夫所著教科書第六頁至第七頁）。

作者引用這段話沒有加一句評語，可見這就是他自己的觀點。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作者真正步上了拒絕馬列主義所固有的哲學中的黨性原則，馬列主義經常與一切唯物主義底敵人進行激烈

鬥爭的不調和性和熱情是大家都知道的。在這種鬥爭中馬列主義者總是給敵人以致命的批評。列寧所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一書是用布爾什維克精神對唯物主義底敵人作鬥爭的模範。在這本書中列寧所寫的每一句話都好像是刺殺敵人的利劍，列寧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天才正在於在幾乎半世紀的長時期中發展唯物主義，推進哲學中的這一基本方向，不停止在重複那些已經解決了的認識論問題，而把唯物主義貫徹到底。他們表明了應當怎樣把這個唯物主義運用到社會科學中去，把那些想「發現」哲學中「新」路線，發明「新」方向的企圖當作是空話，廢語，和野心家的浮誇妄想而無情地掃除乾淨。』

列寧接着寫道，最後我們再看馬克思在資本論以及其他著作中所說的對個別哲學問題的意見，他永遠不變的基本理由就是堅持唯物主義，而恥笑那些模糊不清的觀點和糊塗觀念，以及對唯心主義的讓步。馬克思所有關於哲學的意見，總是論述這兩個根本對立的方向，——從學院派的哲學觀點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缺點也正在於這種『狹隘性』和『片面性』（見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二七五至二七六頁）。

大家知道，列寧自己也是毫不憐惜敵人的。列寧總是把那些想抹煞和調和哲學派別之間的矛盾的企圖認作只是反動的學院派哲學家的詭計。既然如此，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怎麼能夠在他所著的教科書中宣傳對哲學敵人的慈悲觀念，這種宣傳無疑是替學院派偽客觀主義效勞，而馬克思主義却是在與一切唯心主義派別代表作無情鬥爭中發生，生長和獲得勝利的。（鼓掌）



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還不僅以此爲限，他把他的客觀主義的觀點一貫到底地貫串全書內容。所以，他在批評某個資產階級哲學家以前，總是「頌揚」他們的功績，向他們焚香頂禮。例如他提到傅里葉論人類發展四個階段的學說時寫道：

「傅里葉在社會哲學中的最大成就就是：關於人類發展的學說，按照傅里葉的意見，人類社會在其發展中經過四個階段：（一）上升的破壞階段；（二）上升的和諧階段；（三）下降的和諧階段；（四）下降的破壞階段。在最後這個階段中人類是處在衰老時期，此後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就會消滅。因爲社會發展是不以人類意志爲轉移的，發展的最高階段到來的不可避免由於一年四季不斷交替之不可避免一樣。傅里葉從這個原理中得出了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由自由集體勞動統治的社會所代替。固然，傅里葉社會發展論僅限於四個階段，可是這種學說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見阿列克山得洛夫所著西方哲學史第三五三至三五四頁）。

這裡連一點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影子都沒有。傅里葉底理論究竟比什麼是前進一步呢？如果說這種理論的局限性是在於它說人類發展有四個階段而第四個階段就是下降的破壞階段，結果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就要消滅，如果這個理論的局限性是在這裡，那麼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對傅里葉的批評何在呢？是不是批評他的社會發展論僅限於四個階段；而其實人類還有第五個死後階段呢？

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幾乎對所有一切舊哲學家都找到了機會說幾句恭維話。對於聲名越大的資產階級哲學家也就恭維得越厲害。所有這一切就使得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成爲（也許他自己不覺得）資產階級哲學歷史家底俘虜，這些歷史家底出發點首先是把每個哲學家看作是他的同行，

然後才把他看作是敵人。這種觀點如果在我們這裡得到發展機會，必然要引到主觀主義，引到對資產階級獻媚，誇大他們的功勞，剝奪我們哲學底戰鬥進攻精神。而這就是脫離唯物主義底基本原则，脫離唯物主義的階級性和黨性。列寧會教導我們說：『唯物主義本身就包括了黨性的，使我們必須在估計任何事變時直接公開站到一定的社會集團的觀點上』（見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二七六頁）。在這本教科書中對於各種哲學觀點的敘述是抽象的，客觀主義的，中立的。各種哲學派別在這本書中是一個一個先後排列或比肩平列的，却不是互相鬥爭的。這也就是對學院派效勞。無怪乎作者在敘述哲學中的黨性原則時說得毫不明確。作者論到哲學中的黨性問題，舉出了黑格爾哲學作例証，把敵對哲學的鬥爭描寫成黑格爾本身內在的反動原則與進步原則的鬥爭。這種証明方法不僅是客觀主義的折衷論而且顯然是替黑格爾粉飾。因為這樣就是想証明在黑格爾哲學中的進步方面，與反動方面，是一樣多的。爲了結束這個問題我要補充一點，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採用的估計各派哲學體系的方法——「除了功績以外，還有缺點」（見阿列克山得洛夫所著教科書第七頁），或者「這種理論也有重要意義」——是極端不肯定的，是形而上學的，只會把問題弄得一場糊塗。我們不了解的是爲什麼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需要替舊資產階級學院派的科學傳統效勞，而忘記要求與一切敵人作不調和鬥爭的唯物主義底基本原则。

還有一個批評。當用批判眼光來分析哲學體系時應當向着一定的目標。早已擊潰和早已埋葬了的哲學觀點和哲學思想用不着多去注意它。反之，對於那些爲馬克思主義敵人所利用而風行一時的，那怕是顯然反動的哲學體系和哲學思想都應當特別尖銳的加以批評。在這類哲學體系中特

別應當注意批判新康德主義，神學，新舊各色的本體不可知論，以及所有那些想用販運私貨的辦法把上帝及一切其他廢物偷運到現代自然科學中去的企圖，這種企圖底目的，就在於補綴和粉飾那些唯心主義的陳貨，出賣到市場上去。這就是現時帝國主義的哲學奴僕們爲了支持那些驚惶失措的主人而使用的武器。

在導言中對於反動思想和進步思想以及哲學體系的概念的解釋也是不正確的。雖然作者說過，關於某種思想和哲學體系具有反動性和進步性問題，要由具體歷史條件來決定，但是他常常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大家知道的原則，就是同一思想在不同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可能有不同的性質，在某一種條件下是進步的，另一種條件下是反動的。作者抹煞了這個問題，就是故留洞穴讓那些所謂思想具有超歷史性的唯心主義觀點能偷運進來。

再者，作者正確地指出了哲學思想底發展歸根到底是由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哲學思想底發展只有相對的獨立性。可是他自己累次違犯了這個科學唯物主義底基本原則。他往往在敘述各種哲學體系時，把這一種敘述與某一哲學產生底具體歷史環境以及社會階級根源脫節。例如，在敘述蘇格拉底，德漠克里特，斯賓諾塞，雷柏尼茲，費爾巴赫以及其他入底哲學觀點時就是這樣。這當然是不科學的，這就使人有根據的來想，作者是迷誤到哲學思想發展具有獨立性和超歷史性的觀點上去了，而這種觀點就是唯心主義哲學具有的特別標誌。甚至在作者想去分析某一哲學體系產生的環境時，在敘述中也看不見這一哲學體系與具體歷史環境之間的有機聯繫。結果是純粹機械的，文字上的聯繫，而不是本質上的有機聯繫。敘述某些時代哲學觀點的章節與那些

敘述歷史環境的章節平行排列着，並且關於歷史事實，以及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因果聯繫等等，一般說來，都是不科學的，不精細的，不能給作分析用的材料，而只是一種不好的紀事錄。例如第六章的導言：「十八世紀時代的法國」就是如此。這個導言之含糊不清簡直到了頂點，一點也不能解釋法國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初期哲學思想的根源，因此法國哲學家底這種思想就失掉了與時代的聯繫，而成爲好像一種獨立現象似的。讓我把該書中這段話念給大家聽聽吧：

「從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起，法國隨着英國之後，逐漸走上資產階級發展的道路，在一百年過程中，在經濟，政治和思想各方面都起了根本的變化。法國當時雖然還是落後的，可是已經開始擺脫封建愚昧性。正如當時許多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法國也進入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新的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在社會生活底各方面都迅速形成起來了，產生了新的思想，新的文化。這時法國的城市如巴黎、里昂、馬賽和加佛爾等都迅速發展起來。建立了強大的海軍。國際貿易公司相繼創立，並組織了武裝遠征隊，佔領了許多殖民地。商業迅速發展起來。在一七八四到一七八八年對外貿易的流通總額達到了十萬萬零一千一百六十萬里佛爾，較之一七一六到一七二〇年增加了四倍以上。亞亨條約（一七四八年）和巴黎商約（一七六三年）幫助了商業繁榮。特別是圖書的貿易發展得更快，例如在一七七四年法國圖書的貿易總額爲四千五百萬法郎，同時英國却只有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三百萬法郎。法國握有半數歐洲存儲的黃金。但是法國仍舊是一個農業國家，大多數居民都是經營農業」（見本書第三一五至三一六頁）。

當然這不能叫做分析，而只是一種某些事實的列舉，並且這些事實不是互相聯繫，而是比肩

排列着。自然從這些所謂關於「基礎」的事實中沒有得出法國哲學底特點，而且也不能得出，這種哲學底發展成了與當時法國歷史環境脫節的。

再看阿列克山得洛夫在本書中描寫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產生的情形吧。他寫道：「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期德國是一個落後的和具有反動派政治制度的國家。在德國佔統治地位的是封建農奴制度和手工業行會制度。在十八世紀末葉城市居民還不到百分之廿五，從事手工業的只佔全體居民中百分之四。剝削農民的勞役制，農奴制，行會特權等妨害了當時已經產生的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又加上在政治方面是處在極端分裂狀態中。」

按照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底意思，引用德國城市居民的百分比是想表明這個國家的落後和國家制度與社會政治制度底反動性，但是這時法國城市居民還不到百分之十，然而法國當時並不像德國一樣的封建落後國家，而是歐洲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中心。由此可見，城市居民百分比本身還不能說明任何問題，而且這件事情的本身還需要從具體歷史環境中來說明的。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証，表明沒有適當地利用歷史材料來說明某一思想形態底發生和發展。

接着阿列克山得洛夫寫道：「當時德國資產階級著名的思想家如康德，其次如費哈特和黑格爾在其所創立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中，用德國當時實況所制約的抽象形式表現了當時德國資產階級的思想。」

我們且把這個冷淡的漠不關心的，客觀主義的並且無論如何也不能從中得出德國唯心主義產生原因的這種事實描寫法，來與那種用生動的，戰鬥的，使得每個讀者感動而信服的文筆，對當

時德國環境所作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比較一下。請看恩格斯如何描寫當時德國的環境吧：「這簡直是一堆腐爛了，朽腐了的東西。誰也不覺得好過。手工業、商業、工業和農業都衰頹到了極點。農民、商人和手工業者遭受下面兩層壓榨：敲髓吸血的政府和蕭條的貿易。貴族和王公雖然盡量榨取了奴僕底血汗，總還覺得要增加收入來彌補日益增長的開支。一切糟糕，不滿情緒，籠罩全國。沒有教育，沒有啓發群眾智慧的工具；沒有言論出版自由；沒有多少大量的國外貿易；到處都是卑鄙和自私，全體人民都充滿了一種卑下的、奴顏婢膝的、可恥的、唯圖是圖的心理。一切都腐朽了，搖擺了，眼見就要崩潰了，甚至不能有轉希望，因爲在民衆中沒有一種能够掃除這種過時制度底腐屍的力量」（見馬恩全集第五卷第六頁至第七頁）。

我們來把恩格斯這個鮮明尖銳、確切和深刻科學的描寫與阿列克山得洛夫的描寫比較一下，就可看出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沒有很好地從馬克思主義創造者所留給我們的無窮財富中利用現成的材料。

由此可見作者沒有完成用唯物主義方法來敘述哲學歷史的任務，這就使這本書喪失了科學性，把它變成大半是記載各哲學家傳記以及他們的哲學體系，並且這種記載是與當時歷史環境脫節的。這就違反了下面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想要說明從各種社會形態中發生的政治觀點、私有觀點、美學觀點、哲學觀點、宗教觀點等等，首先就要詳細研究這些社會形態生存的條件」

（見恩格斯於一八九〇年八月五日致史密德信，刊載於馬恩信選，一九四七年版，第四二一頁）。

作者對於研究哲學史的目的也是表述得不明確和有缺點的。作者在本書中沒有一個地方說過研究哲學和哲學歷史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繼續發展已成爲科學的哲學，找出新的規律，在實踐中檢閱舊的原則，用新的原則來代替已陳腐的原則。作者主要是從教授哲學歷史的意義出發，從文化教育的任務出發，因此把研究哲學史的全部事業當作消極觀察的學院式研究。這當然是與馬列主義所規定的哲學之爲科學的定義不符合的。哲學也如同任何科學一樣，應當不斷地用排除陳腐的原則，增添新的原則而發展起來，完善起來，豐富起來。

作者專注意於教育的目的方面，由此就給哲學的發展造成止境，好像馬列主義已經達到了頂點，而發展他們的學說已經不是主要的任務了。這樣的議論是與馬列主義的精神矛盾的，因爲這就是已經開始用形而上學的觀點把馬克思主義看成已經是完成到底了的學說，這就只能使生動活潑、富於探求精神的哲學思想趨於枯竭。

寫作哲學史要不損害它的科學性，就不能不注意與自然科學成就的聯繫。作者在闡明自然科學發展問題時也是極不完善的。

在這本書中由於這個原故，就使人無法了解那從現代自然科學成就的強固基礎上生長起來的科學唯物主義之產生和發展的條件。

阿列克山得洛夫敘述哲學歷史時平巧地把宅和自然科學歷史脫節了。例如，在導言中敘述該書基本觀點時，作者一句話也沒有說到哲學和自然科學的相互關係。甚至在似乎決不能不說到自然科學的時候，他也一字不提。例如在第九頁上，作者寫道：「列寧在其各種著作中，特別是唯

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一書中詳細研究了並且大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的學說。」當他說到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時竟能毫不提到自然科學問題以及自然科學與哲學聯繫的問題。

作者對於各個時期自然科學發展水平的描寫所表露的極端貧乏、歪曲、和抽象性也是一目了然。例如論到古代希臘自然科學時只說在當時有了「自然科學的胚胎」（見廿六頁）。論到後期繁瑣哲學時代（十二世紀到十三世紀），只說那時「發現了許多發明和技術的改進」（見一百廿頁）。

當作者想來說明這樣模糊不清的語句時，又只是列舉了一些彼此很少聯繫的發現，同時並作出了驚人的錯誤，令人驚訝作者對於自然科學問題簡直毫無常識。隨便舉個例子吧，當描寫文藝復興時期科學發展時寫道：「學者格里克製造了著名的利用空氣的唧筒，而氣空壓力的存在代替了真空的概念，這一事實最初是由於在馬克登堡關於半球儀器的試驗已經證明了的。人們在幾世紀中爭論過「宇宙中心」到底在什麼地方，可不可以認為地球是宇宙底中心？可是在科學界出現了考別爾尼克，接着是加列里這兩個偉大學者。加列里證明了在太陽上有黑點，並且黑點地位經常改變。他根據這件事以及其他的發現，證明了考別爾尼克的太陽系是以太陽為中心的學說。風雨表教會了人們能預知天氣。顯微鏡的發明代替了以前對於極微小的有機體生命存在的推測辦法，這在生物學發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羅盤針幫助了哥倫布用實驗的辦法證明地球是球狀的結構」（見第一百卅五頁）。

這裡幾乎每一句話都是荒謬可笑的。怎麼可以說氣空壓力可以代替真空的概念，難道氣空的



存在，就否定了真空的存在嗎？怎麼太陽黑點的運動就証實了考別爾尼克的學說呢？

關於風雨表預告天氣的事情可說至今是極不科學的。可惜得很，人們直到現在還沒有學會預告天氣的知識，你們大家從我國氣象台的實際工作中就知道得很清楚的。（笑聲）

再者，難道顯微鏡可以代替推測辦法嗎？最後，怎麼說『地球是球狀結構』？至今我們都以爲球狀二字只能用來形容物體形狀的。

類似上述這樣的寶貝，在阿列克山得洛夫書中是很多的。

但是作者還犯了更嚴重的原則性的錯誤。例如，在第三五七頁上他認爲辯証法是『在十八世紀後半期』的自然科學成果，所已經準備起來了的。這根本與恩格斯著名的學理相矛盾。恩格斯說辯証法是有機物細胞組織的發現，和關於能力不滅和能力變化說以及達爾文學說所準備起來的。所有這些發現都是在十九世紀時代。作者從他的錯誤的觀點出發，於是，用了很多的篇幅來列舉十八世紀的發現，詳細敘述了加爾萬尼、拉拍拉斯、雷野列，可是關於上述恩格斯指出的那三個偉大的發現，僅僅說了下面一句話：『例如，費爾巴赫還在世的時候，就創立了細胞學說，能力變遷說，出現了達爾文說明物種來源的天演論』（第四二七頁）。

這本教科書的基本缺點就是如此，我不來說那些局部的次要的缺點，我也不想重複以前發人已經說過的非常有價值的關於理論和實際方面的批評。

結論就是這本教科書很壞，需要根本改造。但是要改造這本教科書首先就要克服那些不正確的和糊塗的觀點。這類觀點，顯然在我國哲學家，包括領導者在內，都是很流行的。因此我就

要說到第二個問題，關於我國哲學戰線狀況底問題。

## (一) 論我國哲學戰線底狀況

如果阿列克山得洛夫這本教科書得到了我國大多數負領導責任的哲學工作人員的贊同，把它提交了斯大林獎金委員會，希望獲得斯大林獎金，把它推薦為教科書，並且獲得了無數讚揚的評論，那麼其他的哲學工作人員也顯然都同意阿列克山得洛夫的錯誤觀點，這就表明我國理論戰線上有了嚴重的病態。

這本書沒有引起多少重大的抗議，以至需要中央委員會和斯大林同志親自干預，才揭發這本書的缺點，這件事實就表明我們哲學戰線缺乏廣泛的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沒有創造性的討論，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就不能不使科學的哲學工作發生嚴重的病態。大家知道，哲學的著作數量上很不够，質量上也差。哲學專著和論文都是很少看見的。

這裡有許多人說過，需要出版哲學雜誌。出版這樣的雜誌究竟是否必要，還是值得考慮的。『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留在我們腦海中的可悲的教訓尚未消失。我覺得現在發表哲學專著和論文的場所是很大的，可是利用得十分不够。

思維特洛夫同志在這裡說，專門性質的理論作品不完全適合於『布爾什維克』雜誌底讀者。我想這是完全不對的，這顯然是由於對我國讀者及其需要的高度水平估計不足。這樣的意見我以為是由於不了解我國哲學完全不是少數職業哲學家的財產，而是全體蘇維埃知識界的財產。革命

以前的俄國先進的雜誌，頁數很多的厚本雜誌，除了登載文學著作以外，還登載各種科學著作，其中也包括有哲學著作，這種傳統沒有半點不好的地方。我們的『布爾什維克』雜誌底讀者比任何一個哲學雜誌底讀者多得多。若把我們哲學家底創作封鎖在專門的哲學雜誌裡，我以為有使我國哲學工作底基礎縮小的危險。請不要誤會，以為我是反對刊印哲學雜誌的，可是我覺得在我國各種厚本雜誌以及『布爾什維克』中很少登載哲學著作，這就是表明首先要從這些厚本雜誌和『布爾什維克』雜誌來開始克服這個缺點。在這些雜誌上特別是厚本雜誌上現在也間或登載一些哲學論文，引起科學界和一般讀者的注意。我國哲學工作的領導機關，科學研究院底哲學院，哲學講座等等，所研究的題材也是很貧乏的。

我覺得哲學院的情形，也是不可樂觀的。它沒有把外省的工作人員統一起來，沒有和他們聯繫，因此，實際上這個機關不是具有蘇聯性質的。外省的哲學家的工作簡直無人過問，大家知道，他們是一個很大的力量，可惜至今沒有利用。哲學著作的題材包括博士論文在內，都是面向過去，都是些平淡的，不關重要的歷史題目。例如，『考別爾尼克的異端學說的過去和現在』（全場哄笑）。這就要引到繁瑣哲學在一定程度上復活的。從這個觀點看來，在這個會議上有關於黑格爾的爭論也是一件可怪的事情。參閱這個爭論的可說是白費力氣。關於黑格爾的問題是早已解決了的。重新把它提起來，沒有任何根據，在這次會議上除了早已研究過和估計過的材料外，沒有提出任何新的材料。而且很可惜的是這次爭論是純粹繁瑣哲學式的，其毫無結果，正好像從前在某些教派中爭論究竟用兩指還是用三指劃十字才合乎正教的規律，或者爭論上帝是否能創造

他自己所不能舉起的石頭，或者聖母是否處女等一樣（笑聲）。現時的緊迫問題幾乎全不研究。所有這一切將要產生莫大的危險，這種危險的程度，要比你們能想像到的大得多。最大的危險就在於你們當中某部分人已經習慣於這些缺點而不自覺。

在哲學工作中，看不到戰鬥精神和布爾什維克的工作速度。在哲學界中這本教科書某些錯誤觀點與哲學戰線中所有其他部分落後的事實互相呼應，由此可見這不是個別的偶然因素，而是整個的現象。在會議上常常運用「哲學戰線」這一名詞。老實說來，這條戰線究竟在那裏？現在哲學戰線不很像我們關於戰線的概念。提到哲學戰線這一術語，馬上就令人想到有一個由許多戰鬥哲學家組成的隊伍，而且這些哲學家是由完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武裝起來的，他們向國外敵對的思想，向國內蘇聯人意識中資產階級思想的殘餘作全面的進攻，把我國的科學不斷推向前進，並以相信我們的道路是合乎歷史規律的意識以及有科學根據地相信我們事業必然獲得最終勝利的意識，把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武裝起來。

難道現在我國的哲學戰線像一條真正的戰線嗎？它也許更像一潭死水或者是一個離開戰場很遠的安靜的宿營地。戰火尚未燒到面前來，大部分尚未與敵人接觸，偵察工作沒有進行，武器生鏽了，個別戰士盲目作戰，指揮官或者沉醉於以往的勝利，或者爭論着現在是否有力進攻，需不需要外國的幫助，或者爭論意識可以落後於現實生活多少，才不會顯得過於落後。（笑聲）

同時我們黨却極端需要提高哲學工作。在我國社會主義生活中，每天發生的各種迅速變遷，我國的哲學家不去總結，不用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觀點去闡明。這樣就阻礙了我國哲學繼續發展。

的條件，於一就弄到哲學思想的發展大半與我們職業哲學家無關。這是絕對不可容許的事。

當然，哲學戰線落後的原因完全不是客觀條件造成的。客觀條件比任何時候都便利，等待我們去作科學分析和總結的材料可說是無窮無盡。哲學戰線落後原因應當在主觀方面去找尋。這種原因在基本上是與中央分析其他思想戰線方面的落後時所發現的原因正是相同。

你們記得中央關於思想問題的著名決議極力反對在文學和藝術中毫無思想和不問政治的傾向。反對脫離時代題材，逃避到過去領域中去，反對崇拜外國，堅持在文學和藝術中必須具有布爾什維克的戰鬥的黨性。大家知道，在我國思想戰線中有許多隊伍已經從中央的決議中作出了應有的結論，並在這條道路上獲得了很大的勝利。

可是我們哲學家在這方面落後了，顯然他們沒有看見在哲學工作中無原則性和毫無思想的事實，沒有看見輕視現在題材的事實，沒有看見奴顏婢膝地崇拜資產階級哲學的事實。他們大概認為在思想戰線上的轉變是與他們無關的。現在大家都看見，這個轉變是必需的了。

關於哲學戰線落後於其他思想部門工作的事實，大半要歸罪於阿列克山得冷夫同志。可惜，他沒有具備用銳利的批評來揭露工作缺陷的能力。他顯然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而不依靠廣泛的從事於哲學工作同志底經驗和知識。加之，他過去在工黨中依賴很少幾個他最親近的同人和一些崇拜天才的人們（喊聲：對呀！鼓掌）。哲學的活動竟為少數哲學家集團所壟斷，大多數哲學家特別是外省哲學家沒有被吸引來參加領導工作。

這樣，哲學界中的正常相互關係就破壞了。

現在大家都看出編輯哲學史這樣的工作不是一個人可以勝任的。本來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應當一開始就廣泛吸引各種著作家，如辯証法家，歷史唯物主義學家，歷史學家，自然科學家，經濟學家等來參加工作。阿列克山得洛夫同志却選擇了一條編輯教科書的不正確的道路，就是不依靠廣泛的博學的人們。這個錯誤是必需改正的。哲學知識在我國當然是蘇維埃哲學家廣大集體的財產。吸引多數著作家來參加編制教科書的辦法，現時在校訂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已完全採用了的，這本書最近就要出版。在校訂工作中廣之的聘請了學者參加，不僅有經濟學家而且還有歷史學家和哲學家。這種創作方法是最可靠的方法。其中還包括另一個意思，就是把現在相互間沒有充分聯繫的思想戰線上各種工作人員的隊伍統一起來，共同努力解決有一般科學意義的巨大任務。這樣以來，使思想界各部門工作人員互相影響，以免在前進時各自爲戰，互不相謀，而能有組織和團結地作戰，因此就可以最有保證地獲得勝利。

哲學戰線上許多領導工作人員所犯的主觀主義錯誤的根源，究竟在那裡？爲什麼在這次討論會上老一輩的哲學家很公正地責備某些青年哲學家，說他們未老先衰，說他們戰鬥作風和戰鬥精神不夠？對於這個問題大概只能有一個回答，就是沒有充分了解馬列主義和存留有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殘底餘。這一點在下面的這件事實中也表現出來，就是許多哲學工作人員至今還不了解馬列主義。有生命力的創造學說，是要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現代自然科學成就基礎上不斷地發展，不斷地豐富起來的。這種對於我們學說中生動的革命方面估計的不足，就不能不降低哲學的意義和哲學的作用。正由於我們某些哲學家戰鬥作風和戰鬥精神不夠，所以害怕在許多新問題上

，現實問題上試試自己的力量，害怕在解決實踐中每天對哲學家提出的，而哲學家也必須回答的那一問題中試試自己的力量。現在應當是大膽地把蘇維埃社會的理論，蘇維埃國家的理論，現代自然科學的理論，倫理學和美學推向前進的時候了。應該消滅這種非布爾什維克的怯弱性。如果讓理論的發展停滯不動，這就是使我們的哲學萎縮，剝奪它具有發展能力的最寶貴的特點，把它變成爲僵死的枯燥的教。

關於布爾什維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問題，對於我們哲學家不僅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且是一個深刻的理論問題。如果發展過程的內容是像辯証法所說的就是兩個對立方面的鬥爭，舊與新之間的鬥爭，衰亡的與新生的之間的鬥爭，過時的與正在發展的之間的鬥爭，那麼，我們蘇維埃哲學家就應當證明這個辯証法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之下如何發生作用，運用這個規律的特點怎樣。我們知道這條規律在階級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是與在我們蘇維埃社會中不同的。這就是我們進行科學研究的廣大領域，而我們的哲學家是沒有一個人對這個領域進行過研究工作的。其實我們黨早已找到一種特殊形式來揭露和克服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這些矛盾是存在的，可是我們的哲學家因爲膽怯而不敢提到它們）。早已找到蘇維埃社會中那種在新的與舊的之間，衰亡的與新生的之間互相鬥爭的特殊形式，這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並已把它拿來替社會主義服務。

在我們蘇維埃社會已經消滅了互相對抗的階級，因此新與舊之間的鬥爭，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不是表現在對抗階級之間的鬥爭形式中，不是表現在社會生活激劇破壞的變革中，如像資產階級社會那樣，而是表現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形式中，這就是我們發展的真正動力，這就是黨所

掌握的强大工具。這無疑是新的運動形態，新的發展形式，新的辯證規律性。

馬克思說，以前哲學只是解釋世界，現在的問題是在改變世界。我們改變了舊的世界，並建立了新的世界，可惜我們哲學家沒「充分地解釋這個新世界，並且沒「充分參加這一改變世界的事業。在這裡我們聽見一些人想「從理論上」來解釋這個落後的原因。例如，有人說，由於哲學家過於停滯在註釋工作的時期中，因而沒有及時過渡到為專門著作而進行研究的時期。這個解釋當然是說得很好聽的，但是很難使「信服的。當然，哲學家現在應當特別注意創作工作，但這並不是說就要縮小註釋工作，更正確些說，通俗化工作。這些工作也是我國人民所需要的。

應當加緊努力，補上空過了的時間。任務緊迫，急待我們去解決。在偉大衛國戰爭中所獲得的光榮的社會主義的勝利，同時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光榮勝利，這次勝利對於帝國主義者好像根套在它的頸上的繩索。現在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已經移到美國和英國去了。所有一切黑暗反動的勢力，現在都用來同馬克思主義作鬥爭。又把那些原來是黑暗勢力和僧侶們所穿戴的破爛鎧甲：梵蒂岡和人種論，搬了出來，武裝那些替原子金元民主主義服役的資產階級的哲學，又把那些兇暴的民族主義和陳腐的唯心主義哲學，賣身圖利的黃色報紙，墮落腐化的資產階級藝術，都搬出來當作武器。可是，大概力量還不够。現在又在和馬克思主義作思想鬥爭的旗幟之下動員更深廣的後備軍。市井無賴，偵探，盜賊都吸收進去。隨便舉一個新鮮的例子吧，不久前消息報登載了下面這樣的消息：唯利是圖的撒爾脫所編輯的「現代」雜誌上把黑幕小說家尚善納所作的「小偷日記」極力讚揚，好像是發現了新的真理。這本書一開始就寫道：「欺詐，偷盜，男色



，這就是我的主要題材。我的夢詐、盜賊生涯是與我的尋找情婦有密切聯繫的。」著者大概很熟悉這種生涯。尚善納所寫的話劇大登廣告地在巴黎各個劇院上演。並且尚善納本人現在正被美國極力邀請前往、遊歷。這就是資產階級哲學的最新表現。

從我國戰勝法西斯主義的經驗中已經可以看出唯心主義哲學把許多民族引上了怎樣的絕路，這是大家知道的。現在唯心主義哲學又以新的、可鄙的、骯髒的本質出現，這種本質是深刻反映資產階級墮落的卑鄙無恥。在哲學界吸收了市井無賴和強盜、小偷，這真是到了腐化沒落的極端。但是這些勢力還是有掙扎力的，還是能够毒害群眾意識的。

現 資產階級科學供給宗教和神學以新的論証，這是必須無情揭破的。例如，英國天文學家埃定克頓關於宇宙定數的學說簡直像畢納郭里的神秘數字，他從數學公式中得出了宇宙定數的神密數字為六六六，等。愛因斯坦的許多門徒不了解認識底辯証過程，不了解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的關係，而把研究有限的宇宙領域運動規律所得出的結果運用到無限的宇宙上去，而說出什麼宇宙底止境，時間與空間底有限性這類的話。而天文學家米倫甚至「計算出了」宇宙是廿萬萬手以前創造的。對這些英國的學者可以用他們本國的偉大哲學家培根所說的話來批評：他們把自己在科學上的無能拿來詛咒宇宙。

同樣現代資產階級原子物理學家所具有的康德主義的怪想使他們得出什麼電子具有「自由意志」的結論，使他們企圖把物質描寫成爲只是一些電波總和等等鬼話。

這裡是我國哲學家活動的巨大領域，他們應當分析和總結現代自然科學底成果，他們應當記

得恩格斯的指示，唯物主義「每當有新的構成自然科學新時代的偉大發現時就必須採取新的形態」（見恩格斯費爾巴赫論，載於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六四七頁）。

除了我們，除了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家已經獲得勝利了的國家，還有誰能够領導反對腐朽和卑鄙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除了我們，還有誰能給資產階級思想以致命的打擊。

從炮火的灰燼中生長出來了許多新民主主義國家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社會主義提到了各民族人民生活的日程上。除了我們，除了社會主義已經勝利的國家及其哲學家，還有誰能幫助我們國外的朋友兄弟用科學社會主義意識來照耀自己鬥爭的道路；除了我們，還有誰能够啓發他們，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來武裝他們。

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文化在我國正在強大發展起來。群眾社會主義意識的不斷增長，向我們的思想戰線的工作日益提出更多的要求。對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正開展着全面的進攻。除了我們哲學家，還有誰能够領導哲學戰線的工作者隊伍，還有誰能够在綜合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經驗時，在解決社會主義的新任務時，充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有了這些偉大任務擺在我面前，我們就應當問一問，我們哲學家是否能够負起這些新任務？在哲學的火藥庫，是否有足夠火藥？哲學的力量是否被削弱了？我們的哲學工作幹部是否能够用自己內部的力量來克服自己發展中的缺點，重新改造自己的工作？對於這個問題決不能有兩種意見，哲學討論會表明了這種力量是存在的，這種力量是不小的，這種力量是能够揭發自己錯誤，以**來克服**已錯誤的**所需要的**只是對於自己力量**更多的信心**，在積極鬥爭中在提出和

解決現時迫切問題上更多的使用這些力量，應當改變工作中非戰鬥的速度，並應去掉衰頹的作風。從今以後，努力工作，要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那樣工作，像斯大林那樣工作。（鼓掌）

同志們，你們記得恩格斯當馬克思主義書籍出版了兩三千份時是如何高興，把它看作一件有重大意義的巨大政治事變。從這個照我們看來並不算很大的事件中，恩格斯作出了結論，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已經在工人階級中深深地生了根。那麼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現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入到了我國人民各個廣泛階層的事實，會要怎樣說呢？如果他們知道我國哲學著作在民衆中散播了幾千萬份，他們又會怎樣說呢？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勝利，這是馬恩列斯的偉大學說在我國成了全體人民學說的活生生的證明，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所沒有的這種基礎上，我們的哲學必然要發揚起來。我們的時代，是列寧斯大林時代，是我國人民的時代，是我國人民成了勝利者的時代，我們要不愧爲這個時代的人！（熱烈的長時的鼓掌）

## 聯共中央書記日丹諾夫關於「星」

### 及「列寧格勒」雜誌所犯錯誤的報告

同志們！

從中央的決議裏闡明「星」雜誌最大的錯誤，乃是把自己的數頁篇幅，獻給了左勤科阿赫瑪托娃的文學「創作」。我想，在這裏我沒有必要再引用左勤科的作品「猴子歷險記」了，大概諸位已經都讀過了它，知道的或許比我更要詳細。左勤科這篇「作品」的意義，是將蘇聯人民描寫成爲一群怠惰和畸形的人，是一群愚蠢而又落後的人。左勤科絲毫也不考慮蘇聯人民的勞苦，努力和英勇的行爲，蘇聯人們高尚的社會和道德。這種題材在他的作品裏一向是沒有的。左勤科這個市儈和壞傢伙，爲自己選擇了的經常的題材，便是發掘在生活中最低級和瑣碎的方面。這種生活瑣碎的發掘並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所有小市民階層作家們的素質，左勤科也屬其內。高爾基在他的當年關於這方面說得很多。諸位還記得高爾基在一九三四年蘇聯作家代表大會時。會嘲笑過那群所謂「作家」們說：除了在廚房和澡塘裡煤烟以外，再遠一點就什麼也看不到了。「猴子歷險記」並不是左勤科脫出他一貫寫法圈外的東西。這篇「作品」在批評界的視線裡，只認爲他

是左勤科所有的文學「創造」中一切否定的表現最明顯的一篇而已，顯然地，左勤科自從撤退一直到返回列寧格勒以前，他寫出了許多東西，都象徵着他不善於在蘇聯民衆的生活裡找出任何一種正常的現象，任何一個正常的典型。同樣的在『猴子歷險記』裡，左勤科很習慣的愚弄着蘇聯生活，蘇聯制度，蘇聯人民，用一種無聊的娛樂和無的放矢的幽默的假面具來掩飾這種愚弄。

假使諸位把『猴子歷險記』這篇小說再仔細的回味和沉思一下，那麼你們可以看出左勤科是將我們社會秩序最高法官的角色來用猴子去扮演了，同時強迫着蘇聯人民讀閱一種類似教訓的東西。他把猴子描寫成了一個理性的開端者，讓他對人民的品性給以評價。爲了將蘇聯人民的生活描寫成畸形怪狀滑稽而又低級起見，左勤科甚至須與借猴子的嘴說出了極惡的有反蘇毒素的『格言』，這就是說認爲生活在動物園中，要比在自由的空氣中好的多，在籠子裡呼吸要比在蘇聯人們中間舒適些。

難道說還有比這更厲害的道德和政治的墮落嗎？同時列寧格勒人怎麼能够忍受在自己的雜誌的篇頁裡有了像這種的污穢和放肆呢？

『星』雜誌既然能將這類的『作品』擺到蘇聯讀者面前，那麼列寧格勒人和『星』雜誌編輯局的警惕，是多麼貧弱，他們竟然允許在雜誌裡刊載一些獸性地仇恨我們蘇聯制度的有毒的作品。這只有文學的墮落才能創造出這一類的『作品』，也只有瞎了眼睛，不關心政治的人們才能給它以出路。

據說左勤科的小說譽滿列寧格勒的文壇。這類的事實都有可能存在，那麼請問列寧格勒思想

陣線的工作的領導軟弱到了什麼程度！然而，左勤科帶着他的那種極其惡意的精神却竟然能鑽進列寧格勒一家大雜誌的篇頁裡，而且在那裡安排好了一切的方便條件。『星』這一刊物本來應該是教育我們青年人的機關報。但是，該雜誌既然收留了左勤科這樣一個壞傢伙，這樣一個非蘇聯的作家，那麼他還能完成這一任務嗎？難道『星』的編輯部不了解左勤科的面貌嗎？

不久以前——一九四四年初——左勤科的一篇惡劣的小說『日出之前』曾遭受了『布爾什維克』雜誌的嚴厲的批評。這篇小說是他在蘇聯人民爲反對德國侵略而進行解放戰爭最殘酷的時候寫成的。左勤科在這篇文章中，把他自己的惡劣的污穢的靈魂全翻了出來，而且他這樣作的時候，他是具有着一種享樂和欣喜的心情，其目的是告訴一切的人說『我是一個流氓呀！』

左勤科在他的小說『日出之前』一書中所宣佈的那種『精神』之惡劣程度，是我們蘇聯文學中所難於看到的，在這裡，他把人民和自己都描寫成爲沒有羞恥，沒有良心的淫亂的野獸。當我們的人民在那古所未見的空前殘酷的戰爭中流洒着鮮血，當蘇維埃國家正處於千鈞一髮之際，當蘇聯人民爲戰勝德寇而肩負着不可計算的犧牲之時，左勤科便把這種『精神』獻之於讀者面前。

而幽居於大後方——阿爾瑪阿塔的左勤科，在這時候絲毫也不會幫助蘇聯人民和德國侵略者進行戰鬥。『布爾什維克』雜誌把左勤科公開地叱責爲反蘇聯文學的無聊文人和壞傢伙，是極其公平的，當時他對於這種社會輿論置諸不理。如今，爲時未逾兩載，『布爾什維克』雜誌上的批評之墨跡未乾，而依然故我。左勤科凱旋地回到列寧格勒，並且開始在列寧格勒『雜誌』上自由地出現了。不只是『星』很願意刊登他的作品，連『列寧格勒』也是同樣。劇院也很滿意而且有準

偷地忙於上演他的作品。除此而外，而且還使左勤科有可能在蘇聯作家協會列寧格勒分會裡佔有領導的地位，居然在列寧格勒的文學專業中起着有力的作用，你們有什麼理由能允許左勤科自由自在地在列寧格勒文學園地裏散步嗎？爲什麼列寧格勒黨的活動分子，文學組織能夠允許有這種可恥的事實發生呢？

左勤科的腐朽、頹廢到極點的社會政治及文學的特性，並不是在最近才形成的。他的最近的這些「作品」絕不是偶然的生的事。它們只不過是左勤科自二十年代起就從事的文學「遺產」的繼續。

以前左勤科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是所謂「謝拉皮翁兄弟」文學團體的發起人之一。左勤科於組織「謝拉皮翁兄弟」時代的社會政治面貌又是怎麼樣的呢？那就請找一找一九二二年第三號的「文學雜誌」在這裡面發起組織這個團體的人們曾經闡明了自己的主張。在我們所發現的一些文章中，有篇叫「論自己及其」的雜文，在這裡表現了左勤科的「信條」。左勤科對任何人任何事情都不知羞恥的當衆暴露，而且又極公開地說明了自己的政治和文學的「見解」。請你們聽一聽，他在那裏所說的話：

「總而言之，當一個作家是很難的事。就拿思想說吧……現在向作家們要求起思想來了……咳，實在說，我這是不舒服」……「請問，假若沒有一個黨派能吸引我的全部興趣，那麼，我的「正確的思想」應該是什麼呢？同時「從黨派的觀點來看，說我是一個無原則的人，隨它去吧！我對自己只能說：我不是共產黨員，不是社會革命黨員，不是保皇黨，而只不過是一個平

凡的俄國人，因此在政治上完全是沒有興趣的。」……「我說句心裡良心話——一直到今天我還是不曉得，就拿顧奇果夫來說吧……顧奇果夫是那一黨黨的黨員呢？鬼曉得他是什麼黨！我僅知道：他不是布爾什維克，但是不是社會革命黨員或立憲民主黨員那我就知道了，也不願意知道它。」以及類似的話等等。

同志們！你們對於這個「思想」能說什麼呢？自從左勤科發表這篇「說教」以來，已經過了廿五年了，從那時以後他有沒有什麼改變了呢？我們看不出來，他在這廿五年中，不僅沒有學到什麼東西，沒有改變什麼，甚至恰恰相反，竟公開地、極下流地繼續成爲無思想原則性和庸俗的說教者，一個毫無原則毫無羞恥的文藝界的流氓。這意思就是說：左勤科過去是如此，今天仍然是如此不滿意蘇聯秩序。他從前是那樣，今天還是那樣的反對和仇視蘇聯文學。假使左勤科他在這樣一些思想行爲下，幾乎快要成爲列寧格勒的文學巨匠，而能在列寧格勒文壇上受到稱讚，那麼我們就非常驚異那群爲左勤科鋪路的和歌頌他的人們是如何的無原則沒有認識，工作如何不深入和沒有判斷的能力！請讓我們從所謂「謝拉皮翁兄弟」群裡再舉出一個例子來。在一九二二年第三號「文學雜記」中，另一位「謝拉皮翁」派列夫。龍遲也有會企圖給予「謝拉皮翁兄弟」派的惡劣反蘇聯文學的方向以一個思想的根據。龍遲寫道：

「我們是在革命和政治緊張的日子裏集合到一起的，誰不跟我們走誰就是反對我們。」他們從四面八方向我們這樣說。——可是「謝拉皮翁兄弟」們你們和誰走呢？跟共產黨走呢？或是反對革命呢？



「可是我們跟着誰走呢？「謝拉皮翁兄弟」們，我們還是跟着隱士謝拉皮翁走吧！」

「社會性支配俄國文學時期太長也太苦惱了，……我們不希望功利主義。我們不是爲了宣傳才寫作。藝術是現實的，它和生活的本身一樣沒有目的和也沒有意義，它之所以存在着是因爲不能不存在。」「謝拉皮翁兄弟」所追求的藝術的作者，就是如此。他們抽去了他的思想內容，社會意義，歌頌藝術無思想性，歌頌爲藝術的藝術，歌頌爲藝術沒有目的和意義。這就是宣揚腐朽的超政治主義，小市民根性和低級趣味。

從這裡來的結論是什麼呢？假如左勤科、滿意蘇聯的制度，難道你們能够下個命令說：「順應一下左勤科吧」嗎？並不是我們應該改變我們的趣！並不是我們應該將自己的生活 and 制度去適應左勤科！而是應該讓他改變自己！若是他不願改造的話——就讓他從蘇聯文學裡滾出去。蘇聯文學裡決不能有地方登載腐朽、空洞、沒有思想和低級趣味的作品。（激烈的鼓掌）

由於上述的原因，中央才對『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做了這樣的決定。

現在我們來談談安娜·阿赫瑪托娃的文學「創作」問題。她的作品在最近以來，以「擴大再生產」的形態出現在列寧格勒的雜誌上。這件事是如此的驚人和違反常態，猶乎有人想在今天翻印米列日諾夫斯基、維赤斯拉夫、伊凡諾夫、米哈伊爾、庫茲瑪、安得萊、比洛夫、秀娜伊達、吉比屋斯、費多爾、梭洛古勃、紀諾夫也夫、安尼巴爾等人的作品一樣，因爲他們從來就是被我們前進的社會和文學所公認的政治和藝術的叛徒及反動愚民政策的代表者。

高爾基在當年曾經說過，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七年的十年間在俄國歷史文明中可以說是最可

恥最無能的十年，自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背叛了革命的方向，滾到反革命的陣營和猥褻的泥沼裡了，豎起了自己歌頌無思想性的旗幟，用「美麗」的詞句去掩蓋自己的叛變說：「我焚燬了自己所崇拜的一切，而今我崇拜我已將其焚燬了。」也正是在這十年當中，出現了像維貝科所著的「蒼白的馬」、「羅勃施娜」這種叛逆的作品，以及其他從革命陣營裡鑽入反動陣營裡去的逃兵們的作品。他們忙著和那些曾被俄國社會的優秀的和進步的人士所奮鬥過的崇高理想離異。除此，社會裡又浮出了象徵主義派和達達主義派，以及形形色色的頹廢派。他們脫離了人民，高唱「爲藝術而藝術」的論調，宣傳文學的無思想性，他們只追求毫無內容的美麗形式以掩飾自己的思想和道德的腐朽。一種獸性的恐怖使他們在無產階級革命行將到來之前聯合起來。只要我們一回想起反動的文學思潮中的一位最有名的「思想家」米列日諾夫斯基就夠了，他稱無產階級革命是「行將來到的卑賤行爲」，同時他以野性的憎恨迎接了十月革命。安娜·阿赫瑪托娃也正是那毫無正確的思想的反動文學泥沼裡的一位代表人物。她是屬於所謂「阿克梅」(廿世紀初葉俄國文藝上的一種傾向)文學一派的。該派在當年是從象徵主義隊伍裡產生出來的，是空洞，沒有思想的貴族沙龍詩歌的一位旗手，根本就與蘇聯文學背道而馳的。

「阿克梅」派在藝術上是一種極端個人主義的方向。他們宣傳「爲藝術而藝術」，「唯美」的論點，絲毫也不願意去了解人民，了解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了解社會的生活。

按社會根源來說，這是文學裡一種貴族資產階級的思潮。當貴族和資產階級已屆末日的時代，統治階級的詩人和思想家們打算逃避這些使他們不愉快的現實而躲到九霄雲外和宗教神秘的

霧中，躲到個人的微渺的苦難中，挖掘自己的渺小靈魂。「阿克梅」派和象徵主義派、頹廢派以及其他各種沒落的貴族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的代表者們一樣，也是一群宣傳頹廢主義、信仰來世的教徒。

阿赫瑪托娃主要是以戀愛、色情作爲主題，在這個主題中交織着悲哀、憂鬱、死亡、神秘和宿命論的感情，這正是垂死的集團社會意識所表現的感情，它是一種死前之絕望的悲慘調子，是他們的加雜。色情神秘的苦惱，以上這是阿赫瑪托娃的全部的精神世界。她正是那一去不復返的「美好的古喀薩琳女皇時代」古老貴族文化的一點殘餘。

這便是阿赫瑪托娃的全部思想以及她那渺小的、狹窄的私人生活，她那不足道的苦惱及其宗教的、神秘的愛情。

阿赫瑪托娃的詩是完全脫離群眾的。這種詩只是古老貴族的俄羅斯的幾萬個上層人物所讀的東西，對於這些人來說，除了懷念那「美好的往昔時代」之外，是確定的一無所餘了。喀薩琳時代的大地主的別墅，幾百年的菩提樹林蔭路，噴水池，彫刻像，大石門，溫室，情話纏綿的花亭，大石門的古老的國徽，貴族的彼德堡，皇村，伯弗洛夫斯克的火車站以及其他貴族的文化產物，這一切都沉入了可復歸的過去了。這種與人民背道而馳的文化殘跡，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是怪物了，它除了酣睡和生活在空中樓閣之外，已無他事可做了。

「一切都被奪去，都叛變了，被出賣了。」——阿赫瑪托娃這樣的寫着。

關於「阿克梅」派的社會政治和文學的思想，這一派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歐西玻·曼載里施

唐，在革命到來的不久以前曾經寫道：「對於個人及對組織的愛，我們同意中世紀在生理方面的天才解釋。」「……中世紀，按着他自己的方法來判斷一個人的比重的時候，它感覺到，而且承認每一個人的比重，完全和他的功績沒有關係。」「……是的，歐洲會經過精細的文化的迷津，那時候的精神生活是絲毫不被粉飾的，個人生存的本身，就被作為功績來評價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那種……結了人們的種族友情，是完全和大革命的「平等」、「博愛」的精神相違背的……」——我們認為中世紀的所以寶貴，就是因為它有着高度的，有限界的感情……；「這種認識和神秘的崇高的混血兒，這種對世界的感覺，使我們覺得那個時代和我們今天是完全一樣的，而且它鼓舞着我們去到一二〇〇年左右的，在浪漫主義基礎上所產生的作品中，去汲取力量。

曼載里施唐在他所寫這些意見中說明了阿克梅派的希望和思想。「後退到中世紀去了！」這就是這個貴族沙龍派的社會觀念。「後退到猴子時代去」左勤科響應着他。但是阿克梅派和「謝拉皮翁兄弟」們都是傳授他們的共同的祖先的衣鉢。阿克梅者也罷，「謝拉皮翁兄弟」也罷，他共同的祖先是郭弗曼——貴族沙龍頹廢派的阿克梅主義之創始人之一。為什麼忽然間阿赫瑪托娃的詩甚孚群望了呢？她和我蘇聯人民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需要把文壇讓給這種墮落、極其仇視我們的文學方向呢？

從俄國文學史中，我們知道：反動的文學派別，象徵主義和阿克梅主義亦在其列——僅企圖向偉大的民主革命傳統的俄國文學宣戰。反對它前進的代表，企圖抽去文學中高尙的思想性和社會主義，使它降低到沒有思想和庸俗的泥沼裡去。

所有這些「摩登的」思潮都只是曇花一現，他們（自己階級意識的反映者）就和他們的階級一同被拋棄了，他們這些：阿克梅主義者、「黃色短衫」派、「紅方塊王子」派（註：「沒關係主義」派），今天在我們的蘇聯祖國文學裡遺留下了什麼？一點什麼痕跡也沒留下。他們轟轟烈烈地，不可一世地出師反對俄國民主革命代表作家們柏林斯基、杜布羅留波夫、車 尼雪夫斯基、赫爾嶺、沙爾梯科夫、謝德 但他們却極其狼狽的垮台了。

阿克梅主義者們說：「生活不須加以任何改造，生活也不須加以批評。」

（註：即撲克牌中的紅方塊了，當時是一種象徵派的標誌——譯者）

爲什麼他們反對在生活裡有任何的改造呢？因爲「熱愛這個貴族資產階級的老生活，可是革命的人民正想驚動他 這種生活。在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這些統治階級， 們的思想及歌頌者都一起被梁入到歷史的垃圾箱裡去了。

忽然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廿九年，竟在我們的舞台上從新出現幾種博物館裡罕見的陰暗世界裡的東西，而它們隨即開始教育我們青年人，應該怎樣生活，而在阿赫瑪托娃的面前大大地敞開了列寧格勒雜誌的門扉，竟允許她自由的用自己腐化的詩篇毒害青年的意識。

『列寧格勒』雜誌有一期曾發表了一篇阿赫瑪托娃從一九〇九年至一九四四年所寫的作品目錄一類的東西。和其它的性作品陳列在一起的，有一篇詩是她在偉大的祖國戰爭撤退時期寫成的。她在這篇詩裡描寫着自己需要和黑貓分擔的孤獨。這黑貓，像時代的眼睛一樣望着她。

這個題材並，是新的。阿赫瑪托娃會遠在一九〇九年就寫過關於黑貓的故事。這種與蘇聯文

學相背的孤獨和絕望的情緒的貫串着阿赫瑪托娃整個的「創作」歷史的路程

這種詩和我們的人民及國家的利益有什麼相同的地方呢？

一點也沒。阿赫瑪托娃的創作，應該是一種遙遠的往事，它與現代蘇聯的事實背道而馳，更不能被容於我們雜誌篇頁之中，我們的文學，並不是私人企業，用各種趣味去求滿足文學市場。在我們文學裡根本不必要容許各種與蘇聯人民的精神和實質沒有絲毫共同點的趣味和風格。阿赫瑪托娃的作品有什麼是我們的青年值得學習的地方呢？

除掉害處以外一點也沒有。這些作品只能散佈憂鬱的感情，使情緒低落，產生厭世主義，使人們脫離社會生活的現實問題，從社會生活及社會事業的大道上走向個人苦惱的狹窄陰霾中去。

怎麼能叫我們的青年到她那裡去受教育呢？然而人們却很有準備地一會兒在「星」上，一會兒又在「列寧格勒」上，大登起阿赫瑪托娃的作品來，而且還爲她出單行本，這是極大的政治錯誤。

今天，在列寧格勒的諸雜誌裡漸漸出現一些無思想性及墮落的陣地裡爬的作家的作品，這當然並不是偶然的事情。我在這裡所指的是薩多菲夫和果米莎洛娃一類的作品，薩多菲夫和果米莎洛娃在他們的幾首詩裡開始和阿赫瑪托娃一唱一合，培養崇拜阿赫瑪托娃精神的憂鬱、哀愁和孤獨情緒。

這一類的情緒，或者宣傳這一類的情緒，只能給我們的青年以惡劣的影響，而他們的意識只能被腐朽的無思想性，對政治淡漠和憂愁等精神所毒害，這是不言而喻的事。

假使我們以憂愁的情緒和對我們的事業無信仰的精神去教育青年人的話，會收到如何的結果嗎？那便是：我們不能在祖國戰爭中獲得勝利。正因為蘇聯國家和我們的黨，以在蘇聯文學的幫助下以勇敢及對自己的力量有充分信心的精神教育了我們的青年，因此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上克服了極大的艱難，在與德寇和日本作戰中獲得了勝利。

從這裡証明了什麼呢？從這裏証明了『星』雜誌，在自己的篇幅上在登載優良的有思想的，生氣勃勃的作品外，同時發表了沒有思想的庸俗反動的作品，而使雜誌成爲沒有方向的刊物，使雜誌成爲助長敵人瓦解我們的青年的工具。而我們的雜誌一向之所以有力量，正是因爲它發表了優秀的革命的作品，而不是宣傳折衷主義者，無有思想性和對政治的漠不關心。

然而，對無思想性的宣傳却能在『星』雜誌裡得到了平等的權利。除此，左勒科竟在列寧格勒作家組織中擁有很大的勢力，以至於敢於隨便責備不同意他的意見的人們，敢於以寫文章來批評的方法對他們加以威脅。也好像已經成了文學界的獨裁者。一群崇拜者圍在他的身旁爲他創造榮譽。請問他有什麼理由可以如此呢？你們爲什麼能夠允許有這種反常的和反動的事情發生呢？

今天，在列寧格勒文學雜誌裡開始迷戀於西歐現代的低級資產階級趣味的文學，這並不是偶然而的事。我們的某些文學家們不把自己看作是資產階級小市民外國作家的導師，竟使自己成爲他們的學生，漸漸在外國小市民文學面前開始表現阿諛和傾倒的態度，這種諂媚的態度，對得起曾經把蘇聯制度建設得比任何資產階級制度好百倍的那些蘇聯的愛國志士嗎？對得起我們先進的蘇聯文學嗎？這在西歐的小市民——資產階級的不足道的文學面前表現的這樣阿諛的態度，對得

起已稱為世界上最革命的蘇聯的先進的文學嗎？

還有，我們作家中的最大缺點，便是和蘇聯今天的現實的題材脫離，一方面，他們單方面的熱中於歷史上的題材，而另一方面，則企圖選擇單純消遣的，空洞無物的主題。有些作家們，在辯護他們自己落後於今天的偉大的蘇聯的現實時說，似乎現在人民是需要空洞一些的，供消遣的文學的時候了，而作品的思想內容則是不考慮的。這是對我們人民，他們的要求及其興趣之一種極其天真的了解。我們的人民，所期待於我們——蘇聯的作家們，是把人民在偉大的祖國戰爭中所創造出來的極豐富的經驗加以理解和體會，將它們普及起來，希望作家們把今天——當趕走敵人以後，在我們國家恢復國民經濟工作中的英雄主義加以描寫，使之普及起來。

我關於『列寧格勒』再說幾句。勤科也和阿赫瑪托娃一樣，在這裡的陣地比在『星』上更鞏固一些。左勤科和阿赫瑪托娃已經成了兩大雜誌的文藝的主力，因此，『列寧格勒』雜誌就要負有責任，因為它把自己篇幅給了左勤科及如此的沙龍女詩人阿赫瑪托娃。

除此，『列寧格勒』雜誌也有其他別的錯誤。

就舉一篇一位所謂哈金氏寫的關於「尤琴·奧涅金」的打油詩吧。這篇東西名之為「奧涅金的歸來」。據說，它常常在列寧格勒舞台上演出。什麼列寧格勒人能容忍這樣著名的講台上來辱罵列寧格勒（像哈金所作的）？因為這所謂「文學上的打油詩」的全部思想，還不在於單純的諷刺那在今天的列寧格勒所出現的奧涅金身上發生的困苦經歷。而哈金所寫出的這篇諷刺詩的思想在於他把我們今天的列寧格勒和普希金時代的彼得堡相比，並且證明說，我們的時代比奧



涅金的時代更壞些。我們就拿出這「打油詩」中幾行來看看吧。在我們今天的列寧格勒中的一切，都是作者所不喜歡的。他誹謗，咒罵蘇聯人民，誹謗咒罵列寧格勒。因此，按照哈金的意見來說，奧涅金的時代，是一個黃金時代。現在呢？就完全不同了，出現了住宅管理部、糧票、通行証。而那些天仙般的，曾使奧涅金如此傾到的美妙的姑娘們，現在都成了街市交通的指揮，修理起列寧格勒的房屋來了。

讓我們只舉出這篇「打油詩」的一段來看看。

在電車裡坐着尤琴，

呵，這個可憐的人，親愛的人，

他的那無知無識的世紀，

從不知道有這樣的交通。

連保佑着尤琴，

只是腳上被踩一下，

又只一次撞在他的肚子上，

對他說：「你這傻瓜！」

他一起起那古昔的秩序，

就想就決鬥來結束這場爭執，

當他把手插到衣袋中……

才發現有誰把他的手套早已偷了去。

因為他失了竊，

奧涅金默然了，

也把他的氣憤平息。

看，列寧格勒會是什麼樣子，而現在却成了什麼樣子——是一個惡劣的、不文明的、愚笨的，而且是極不雅觀的面貌出現在這可憐的，親愛 奧涅金面前了。這個壞傢伙哈金把列寧格勒和列寧格勒人就寫成了這個樣子。

在這篇誹謗的「打油詩」裡，便是這種惡劣的咒罵的腐朽的意圖。

『列寧格勒』編輯部怎麼能够刊登這種對列寧格勒及其優秀的人民的惡意的咒罵呢？

怎麼能够允許哈金之流的人登上了『列寧格勒』雜誌的篇幅之上呢？

再拿另一篇作品——也是如此寫成的對涅克拉索夫的打油詩，這篇文章的本身就是對涅克拉索夫這位偉大的詩人和社會活動家的直接的侮辱，任何一個有教養的人，面對着這種侮辱，應該生氣憤填胸的。可是『列寧格勒』雜誌却好像如願以償地把這樣髒的臭水放到它的篇幅上去。

我們在『列寧格勒』雜誌，還能找到什麼呢？

還能找到十九世紀末期的國外的平凡的趣事。難道說除此『列寧格勒』雜誌就再沒有什麼東西來充實它的篇幅了嗎？難道說在『列寧格勒』雜誌上再沒有什麼可登的了嗎？我們很可以將列寧格勒的恢復工作做爲主題來寫作的，城市中正在進行着雄偉的工作，城市正在醫治它的被敵人

所帶來的創傷，列寧格勒的人們正充滿着熱情和興奮努力於戰後的列寧格勒的恢復工作。「列寧格勒」雜誌關於這方面登過一些什麼沒有呢？

我們再舉出蘇聯婦女兩個主題吧，難道能够在蘇聯的男女讀者中間，以阿赫瑪托娃所具有的對婦女的使命及天職之卑視的觀點來教育他們嗎？難道以今天的蘇聯的婦女能給以真正正確的認識嗎？尤其是對這些在戰爭中的年代中肩負過艱巨的困苦，今天在解決經濟恢復工作中的困難問題而自我犧牲的勞動着的列寧格勒的婦女，能够不給以真正正確的認識嗎？

我們可以看出，作家協會列寧格勒分會的工作立場就是這樣的，它所供給兩大文學藝術刊物的優秀作品極其不够。這就是為什麼黨中央決定封閉「列寧格勒」雜誌，以期能把一切優秀的文學的力量集中於「星」這一刊物上的原因。但這自然不是說，列寧格勒在現有的條件下不能有第二個或第三個刊物。

問題是以質量中的優秀的作品的數量來決定的。如果這樣的作品出現得很多，而在一個刊物上的篇幅已不敷用的時候，將可以創刊第二個或第三個雜誌，只要我們列寧格勒的作家能够供給這思想方面、藝術方面優良的作品。

關於「星」和「列寧格勒」兩大雜誌工作，聯共黨（布）中央的決定所揭露及指出的錯誤和缺點就是這樣的。

這些錯誤和缺點的根源在什麼地方呢？

這些錯誤及缺點的根源就在於上述兩大雜誌的編輯，我們蘇聯文藝界的活動家，以及列寧格

勸我們思想陣線的領導者忘記了列寧主義關於文學的某些基本的論點。有許多作家，作負責的編輯工作的同志，或者作家協會佔有重要崗位的人們都以爲政治——這是政府的事情，黨中央的事情。而對文學家呢？從事政治那就不是我們的事情了，一個人寫得很好，很藝術，很美麗，雖然這裡面有誤人子弟，毒害我們青年的腐朽的地方也在所不管，就可以發表了。而我們要求我們文藝界的領導同志以及作家同志們，都被政治所領導，沒有它，蘇維埃制度就不能生存。我們要求，我們不是以頹廢，無思想原則性的精神來教育青年，而是以朝氣勃勃的精神和革命性來教育我們的青年。

大家都知道，列寧主義在其本身中體現了十九世紀的俄國的民主革命家的一切優良的傳統，而我們蘇聯的文化，便是在過去的批判地改造過了的文化遺產的基礎上發生、發展，乃至到達了繁榮的地步。在文學領域中，我們黨會非止一次地引列寧和斯大林的話指出偉大的、俄國的革命的民主作家及批評家，如柏林斯基、杜布羅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沙爾梯科夫、謝德林、普列哈諾夫等的巨大意義。從柏林斯基開始，俄國的革命民主的知識分子之一切優秀的代表們，從來沒有承認過所謂「純藝術」，「爲藝術藝術」，而他們就是「藝術是爲了人民」及藝術具有最高的政治思想性及社會意義的主張者。藝術決不能把自己和人民的命運分開。請回憶一下有名的柏林斯基的「致果戈里的一封信」吧，在這封信中，偉大的批評家以其全部的熱情責叱了果戈里，因爲他企圖叛變人民的事業。轉到沙皇方面去。列寧稱這封信爲一種沒有被沙皇檢查的民主出版界極優秀的作品，它在今天還保有巨大的文學的意義。

請回憶一下杜布羅留波夫的一些文藝評論的文章吧，在這些文章中，他極其有力地指出了文學的社會意義。我們俄國一切的革命民主的評論，都是充滿着對沙皇制度的不共戴天的仇恨，而滲透着爲着人民的基礎利益，爲着人民的教育，爲着人民的文化，爲着人民從沙皇制度的枷鎖中的解放，鬥爭之崇高的努力。

戰鬥的藝術 領導人民，爲人民的美好理想而鬥爭的——俄國文學的偉大的代表們是這樣地認識文學和藝術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一切空想社會主義者中最接近於科學社會主義的人，從他的作品中，如列寧所指出的「發散着階級鬥爭的氣味」，他曾教訓我們說，除了認識人生以外，藝術的任務還在於教導人們正確地評判這樣的或那樣的社會現象。車爾尼雪夫斯基最接近的朋友和戰友杜布羅留波夫指出：「不是生活按着文學的標準前進，而是文學適應生活的方向而改變」，他竭力宣傳現實主義的原則及文學的群眾性，他認爲藝術的基礎是現實，它是創作的源泉，藝術在社會生活中有着積極的作用，它能有組織社會的意識。按着杜布羅留波夫的意見，文學必須爲社會服務，必須對現實的最尖銳的一些問題給人民以回答，藝術又必須是站在自己時代的思想水平之上。

作爲柏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布羅留波夫偉大傳統承繼者的馬克思文藝批評，從來就是現實主義社會真實藝術的保護者。普列哈諾夫寫了很多東西，其目的就在於揭露那些對文學和藝術空想的、反科學的認識，並且保衛我們偉大的俄國民主革命家教育我們的：把文學作爲服務於人民的有力手段的基本論點。

列寧是以極嚴格的明確性規定了前進的社會思想對文學和藝術的關係的第一個人。這裏，我們請大家記起列寧於一九零五年所寫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這篇有名的文章。在這裏他以其所特有的力量指出：文學不應該是標新立異的，而是應該是總的無產階級事業重要環節的一部分。在列寧的這篇文章中奠定了一切的基礎，在這些基礎之上，建立起我們文學的特點。列寧寫道：

「文學必須成爲黨的。和資產階級的風格不同，和資產階級的僱傭的、商業性的出版界不同，和資產階級文學家的地位主義不同，和個人主義不同，和老爺們的無政府主義不同，和掙錢的目的不同，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必須提出黨的文學的原則，發展這個原則，並把這一原則在儘可能完整的、精細的形式中實現出來。」

那麼黨的文學的原則是什麼呢？

列寧主義認爲：我們的文學不應該是與政治漠不相關的，也不能是「爲藝術而藝術」的，他承認在社會生活中起着重要的、前進的作用。

文學的黨性——這一系列的原則就是由此出發的，這是列寧對於文學的科學的重要的貢獻。

由此可見，蘇聯文學的優秀傳統就是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優秀傳統的繼續。這一傳統是由我們的民主的革命家們柏林斯基、杜布羅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沙爾梯科夫、謝德林所創造的，被普哈諾夫所繼續。又由列寧和斯大林加以科學的改造而創立的。

涅克拉索夫稱自己的詩歌爲「復仇和憂傷之歌」。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布羅留波夫視文學爲對人民的神聖的服務。俄國的愛好民主的知識分子的優秀的代表們，在沙皇制度條件之下，爲此崇高的思想而犧牲，爲這種傳統而赴難。我們怎麼能够忘掉這一切？我們怎麼能够允許阿赫瑪托娃和左勤科把「爲藝術而藝術」的口號拖出來呢？

列寧主義承認我們的文學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如果我們蘇聯文學降低了自己的這一巨大的教育工作，這就是說我們要後退到石器時代去。

斯大林稱我們作家爲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一定義，有着深刻的意義的。這是說蘇聯的作家們對於人民的教育，對於蘇聯青年們的教育，以及在文學工作上不能允許有任何污點等方面，負有重大的責任。

有些人很奇怪，不明白黨中央爲什麼在文藝問題上，採取這麼嚴厲的步驟。

有人認爲，如果在生產工作上犯了錯誤，沒有完成生產計劃，那麼在這裏採取嚴厲的手段當然是很自然的事（大笑），而如果在教育人類靈魂方面犯了錯誤，在教育青年方面犯了點錯誤，這倒是可以容忍的事。難道說這不是比未完成生產計劃更大的錯誤嗎？

因此，黨中央就不能不出來干涉，並且堅決地糾正這件事情。黨中央對於那些忘掉自己對於人民的義務，忘掉了自己對青年教育責任的人們，是沒有權利緩和它的打擊的。如果我們願意以我們積極分子所應有的注意力來對待思想陣線工作上的諸問題，把工作整頓起來，給工作以方向，那麼我們就應該真正像蘇聯的人民，像布爾什維克一樣，批評工作的錯誤和缺點。只有這樣，

我們才能够把事情糾正過來。

有些文學家們這樣的認識問題：他們說在戰爭期間，人們已經在文藝方面飢餓很久，那時書籍出版得很少，讀者已經對任何作品都不加選擇地讀了起來，所以給人民一切東西去讀。然而事實並不完全。此，我們是不能容忍被一些糊塗的不善於選擇的文學家們，編輯們和出版者們所塞給我們的任何文學的。

蘇聯人民期待我們作家的其思想上的武裝，是那些能够幫助他們完成偉大的建設計劃，完成恢復和進一步發展我們國家的國民經濟的計劃之精神食糧。蘇聯人民向文學家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們希望滿足他們思想上和文化上的需要。在戰爭期間，因為情況的關係，我們曾未能保證這些存在着的要求。人民希望意味一些進行着的事變。他們的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提高了，他們常常不滿足於在我們這裡所發現的文藝作品的質量。這些都是某些文藝工作者及思想陣線上工作者所不明白和願意明白的。

我們人民的要求和興趣水平現在已經提得很高了，誰要是不願意或者沒有能力提高到這樣的水平，他便將殘留在後面。我們的任務不僅是在人民需要的水平上前進，除此，它有義務發展人民的興趣，提高他們的要求，用新的思想來豐富他們，引導着人向前進。誰要是沒有能力引導人民前進，誰要是沒有能力滿足他們的日益增長着的要求，就不能解決發展蘇聯文化的問題，他必不可避免地成爲誰都不需要的！。

由於『星』和『列寧格勒』領導同志們思想上存在着缺點，從此就產生了另外的錯誤。這個



錯誤已是有某些領導同志們把自己對於文學家們的關係，不是建立在蘇聯人民教育的利益之上，不是建立在文學家們政治方向的利益之上，而是建立在私人的利益、友誼的利益之上。據說，有許多思想，不正確，在藝術方面也很軟弱的作品，就是因為不願意得罪這個或那個作家，而就予以出版了。從類似的工作人員的缺點來看，爲了不得罪人，最好還是不去照顧人民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這是一件完全不正確的，政治上犯錯誤的事情。這就等於用一百萬元去換一個銅板。

黨中 在自己的決定中指出在文藝工作中以溫情關係代替原則關係之極大的害處。在我們某些文學家們之間的無原則的溫情主義的關係起了極大的反作用，使許多作品的思想水平降低了，使一些非蘇聯文學的作品很容易鑽到蘇聯文藝裏面。

由於列寧格勒文藝陣線上的領導者們方面及列寧格勒的刊物的領導者方面批評的缺乏，由於以犧牲人民的利益而把友愛的關係代替了工作關係的緣故，這就帶來了極大的害處。

斯大林同志教育我們說：如果我們要保存幹部，要教育和培養他們，我們就不應該害怕得罪什麼人，就不應該害怕原則性、勇敢的、坦白的、客觀的批評。任何的組織，包括文學的組織在內，多有批評便會腐朽。如果不醫治的話，任何的病都會深入膏肓，難於再好。只有勇敢和坦白的批評才 幫助我們的人民修養得完美，鼓勵他們前進，使他們認識及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那裡沒有批評，那裡的腐朽和停滯就會生根。那裏也就沒有向前的進步。

斯大林同志不止 地指出我們的發展的最重要的條件，便是必須使我們每一個蘇聯人每天都把自己的工作做一總結，毫無懼怕地檢查自己，分析自己的工作，勇敢地批評缺點和錯誤，周

密地思考，怎樣才能使自己的工作得到更優良的成績，而斷地努力工作使自己精通起來。

對於文學家們，這一點和對其他的工作人員是一樣的。誰要是害怕批評自己的工作，誰就是遭人卑視的懦夫，他就不配受到人民的尊敬。

在蘇聯作家協會常委會裏，那種對工作的沒有批評的態度，對文學家們的原則態度之被友情關係所代替是廣泛地散佈着。作家協會常委會，尤其是協會的主席吉洪諾夫所犯的錯誤便是那些已被揭露了的在『列寧格勒』和『星』中所表現了的不正確立場，同時他們的錯誤在於他們不僅是沒有阻止左勤、阿赫瑪托娃以及其他非蘇聯作家影響對蘇聯文學的侵入，而且放任了反蘇聯文的傾向和風格向我們刊物的侵入。

對『列寧格勒』雜誌質量低落起了很大作用的又一原因，便是雜誌領導上的毫無責任性的制度，在『列寧格勒』雜誌的編輯部裡，就不知道誰是對雜誌負責總查，誰是負責各部的。在這種形下，就是起碼的秩序也是不會有的。這種缺點必須加糾正，這就是黨中爲什麼派了『星』雜誌的總編輯去負責這一刊物的方向，以及提高思想及藝術質量的原因。在雜誌裡，也像在其它的在工作中一樣，是不能容忍無政府狀態及無秩序的現象的，必須意識到一個雜誌的責任，因此就必須提高在雜誌中被刊登出來的材 的思想和藝術的水平。

你們應該恢復起列寧格勒的文學及列寧格勒思想陣線的光榮傳統，當我們作結論說那會一向是進步的思想，進步文化的苗床的『列寧格勒』雜誌，如今成了無思想性的避難所時，我們是非常惋惜的。應該把作爲進步思想和文化中心內列寧格勒的往日的榮光恢復起來。必須永遠記住：

列寧格勒曾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搖籃。在這裡列寧和斯大林會開始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國家，開始恢復列寧的城市進步思想文化中心的固有的光榮之榮譽事業。你們的任務是把文學中的所存在的無思想性剷除，並把蘇聯的文學提到最大的高度。

蘇聯作家們的創作，必須不是爲了某些個別的人，而是爲了人民。我們不能生活在社會裡而脫離社會去自由自在，不能爲個別的集團而去創作。

爲了把文藝提到應有的高度，就必須剷除無思想性和庸俗。這是非常必需的。必須提高和前進，使之不落後於我們國家的進步，而使自己更加改善，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應該採用今天的題材，使文化發展起來。

社會主義國家，這一具有進步制度的國家，它有着進步的文化。因此我們應該教導西方的文學家們，資本主義的服務者們，而不是向他們去學習。我們必須引導他們跟我們走。在我們隊伍裡不應該有阿諛及消極的防禦。我們應該和西方的腐朽的思想進行積極的鬥爭。儘管存在着各種各樣的障礙，全世界是會認識蘇維埃國家及其制度的真理的。

尤其是在今天，蘇聯在祖國戰爭的前線和後方的英勇戰爭，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鬥爭，更說明了許許多多的真理。

蘇維埃作家應該引導着群眾跟着自己走，他必須要大踏步前進，指出道路，而不是拖在時代的後衛之中。

而在列寧格勒的雜誌「星」和「列寧格勒」却是相反的現象。這現象之所以發生，是因爲市

，尤其是宣傳部只迷戀於要求材料的問題，而忘記了最主要的事，即我們雜誌的思想水平的問題，忘記了文學是教育青年一代的，因此文學家們，就必須是站在前進的陣地上。

可是已經腐朽了的西方資產階級能有什麼好東西去教育人們呢？什麼好的也沒有。這些東西就不許可侵入到蘇聯文學中來的，這是絕對的。蘇聯文學家們必須是在思想上堅強的，而不是與政治無關的人。文學是教育人民的，而我們的人民已經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因此他們所需要的作品，也是具有高度的思想和藝術水平的東西。

# 論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

亞斯列波夫  
天 譯作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說，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我們的黨不能容忍有絲毫的不堅定性和無原則性的表現，要求我們工作人員能經常不折不扣地完成自己的任務，經常站在政治活動家的崗位。

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就是對一切稍微脫離黨的原則、思想和政策的傾向之不可調和的精神。黨的政策是蘇維埃制度之生命源泉，黨的工作者在自己一切大小工作中，均應以黨的政策為行動指南，從政治的、原則性的路線出發。

列寧教導我們說，政策是從聯繫到千百萬人利益的事情出發的。有原則地、從政治上去對待問題，就是說要從千百萬人及他們之間相互關係的觀點來觀察問題。這就不能在本位主義的、地方性的、朋友關係等利益面前作絲毫的讓步。布爾什維克重視友情、同志關係，但是他認為評定一個人行為的最高標準是看這個人如何對待由蘇維埃國家所代表的人民利益。

列寧寫道：『我們承認同志間的義務，承認有援助一切同志的義務，承認有耐心聽取同志們意見的義務，但對我們來說，同志間的義務是從對俄國的和世界社會民主黨的義務產生出來的，不能把它顛倒過來』（列寧全集第二卷五四一——五四二頁）。

由此可見，在原則性的精神上教育幹部，這就是說必須作到：在決定任何問題時，幹部不是從私人的或地方的利益出發，而是從國家的利益出發；在一切場合堅持這種利益，並與反國家的傾向作鬥爭。每個工作人員底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表現在他對自己所擔負工作之態度上，而檢查他的原則性，就看他是否把自己的工作服從於國家當前的重大政治任務。評定一切措施的標準是：這些措施是鞏固還是削弱我們的偉大事業，促進這種偉大事業的繼續發展還是妨礙其發展。這一點也應作為測量一切工作人員之布爾什維克原則性的標準。

現實在證明着，不善於正確判斷各種現象和不善於有原則地對待問題，會受到嚴重的損失。拿「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編輯部所犯的錯誤為例來說——這些錯誤被聯共中央及時地揭發了。這些錯誤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領導工作人員不是把正確的教育蘇聯人民和政治上指導文學工作者的活動的利益作為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而是以私人的、朋友的——就是說，庸俗的利益為其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由於他們不願意破裂朋友的關係，所以他們對沒有價值的、反藝術的、脫離政治的作品不作批評。由於他們害怕得罪朋友，便登載了非常不適當的作品。聯共中央的決議裏說道：「這種自由主義，把人民的與國家的利益、正確的教育我們青年的利益作了朋友關係的犧牲品；它閉塞了批評。結果是：作家們停止繼續深造，喪失他們對人民、對國家與對黨的責任感，他們也就停止前進了。」

或者我們再拿對外國阿諛逢迎的事實來看看。很顯然，我們一部分落後的知識分子，還沒有擺脫掉這個可恥的毛病。一些黨的和經濟的領導者們，不用蘇聯民族自豪的精神來教育人們，却

對媚外的奴顏婢膝事實妥協。這還不是無原則性的表現嗎！

這說明，需要在一切問題上表現原則性。在黨的工作中尤其必要。從政治上處理問題的態度——是黨的工作中的基本態度。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黨的生活與黨的工作之基礎，在於黨在當時所採用的或能够採用的那一些組織形式，而在於黨的政策，黨的對內和對外的政策』（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第二卷四一九頁）。這就是說，我們的工作人員應當不僅是好的組織者、熟練的實際工作者，而且也是政治上成熟、思想上堅定的人。

深刻的思想，對馬列主義偉大思想之正確性之堅定的信念，便是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之基礎。只有在原則上堅定不移，很好的掌握了馬列主義的思想的人，才能具有戰鬥的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才能從黨的原則立場上去對待問題。

馬列主義的理論給予幹部以光明的前途，使他們在工作中具有信心；這種理論發展他們的才能，使其能從小的事情看到大的事情，能於日常的、眼前的工作中感覺到是在爲了偉大的理想而鬥爭。反之，對理論不關心的態度便會使其失掉前途。論到不關心理論的人們時，斯大林同志說過，他們有從政治活動家變成爲政治上的庸人，變成無原則的脫離政治的事務主義者的危險。斯大林同志說：『關於這種游離不定的人們，偉大的俄國作家果戈里曾頗中肯地講過：「那些沒有定見的人物，是既非此，又非彼，反正你不能理解他們是些什麼人，簡直是非驢非馬。」』（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第二卷六九〇頁）。

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乃是在思想上、原則性上教育我們幹部的的方法；同時也是提高他們

戰鬥力的最重要方法。偉大馬列主義的思想，乃是我們幹部精神力量之活的源泉，是幹部之堅決性及其在克服困難中永不枯竭的精力之活的源泉。實際的經驗在在都證明着，思想開展的人們在實踐中也更有力量；他們在工作中有更大的信心，暫時的失利不能使他們灰心，他們堅強地向既定的目標前進。正因為如此，黨便要求我們的幹部有系統地、努力地進行自我學習，以精進馬列主義的理論。

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是一種對一切缺點的不能容忍性，它是在高度嚴肅性的情況中養成的。關於以原則性的精神教育幹部儘管高談闊論，但如單黨的委員會不表現足夠的嚴肅性，姑息地對待工作人員的錯誤，那他便會給布爾什維克的幹部教育招致嚴重的危害。比如，在伏羅希洛夫格勒省黨委便存在着這種實際情況。不久以前，國家計劃局的代表揭發了「克拉」諾頓煤礦」拖拉斯和「卡基也夫煤礦」托拉斯兩企業中多報礦井中探煤量的事實。他將這些通知了聯省黨委領導同志。據估計，將會加以處理。但省黨委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原則性，沒有注意兩企業中領導者違犯國家利益之行動，沒有使他們受到處分。

作一個有原則性的人——就是說不怕得罪任何人而直爽、誠懇地指出他的缺點。領導者應當善於「用布爾什維克所固有的那種全部直爽態度發表自己的意見……」像布爾什維克那樣明白而公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一版，三九八頁至一四四頁）。同時，有原則性的人，他本身也不怕勇敢的、坦白的、客觀的批評。

批評乃是布爾什維克的幹部教育方法的靈魂，在對批評的態度上也可以檢驗一個工作人員底



原則性。一個工作人員不能把布爾什維克的、有益的批評看作是對自己的侮辱，看作是自己的威信的損害，因而把自尊心看得高於工作的利益。他應當有勇氣批評別人，也善於勇敢地接受批評。

「任何一個組織沒有批評的話，都會腐朽的。沒有批評，則任何毛病可以滲入膏肓，較難治療。只有大膽地、公開地批評，才能幫助人們變得日益完善，才能促起人們前進，克服工作中的缺點。凡是沒有批評的地方，那裏便從根本上腐爛發霉，停止不前，那裏便沒有可能前進。」（日丹諾夫）

可惜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對批評的不能容忍態度，竟以報復所謂「欺侮者」相威脅，而有些竟然實際地威脅起來了。可舉這樣一件事實爲例：黨員伊萬年科同志會同其他一些同志正確批評了莫斯科——庫爾斯克鐵路配車處的工作中的一些嚴重的缺點和該處處長斯米爾諾夫同志。斯米爾諾夫不去傾聽批評與按照布爾什維克的精神改正工作中的嚴重缺點，反而把伊萬年科同志的工作辭掉了。甚至當伊萬年科奉部令恢復了工作之後，斯米爾諾夫却硬降低了她的工作職位：按她的專門技能本是工程師，現在却要她當統計員。奇怪的是，鐵路局黨組織的領導者們對此熟視無睹，事實上是助長了斯米爾諾夫同志的「正確行動」。

不能容許這樣一種用處理家務事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的情況之存在。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解決問題，妨礙對缺點的揭發與糾正，對教育做爲政治活動家的工作人員是有危害的。

缺乏原則性，沒有布爾什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有時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在庫爾罕省黨委的實例中可以看得很明顯。該省黨委的前任書記沙拉波夫同志，以朋友關係代替了工作中的黨的

原則性。省黨委中形成了一種一團和氣，泰然自若的風氣，黨的與蘇維埃的積極分子中間出現了無紀律性與放蕩散漫的分子。沙拉波夫同志自己已不關心工作。竟有這樣的情形，當農村工作火熱的時候，他却去找自己的朋友和熟人遊逛去了。這樣得到了什麼結果呢？結果是：在該省許多區裏播種進行得不好，收割與交納糧食的工作也準備得很不好。省黨委的委員們都知道這一切情形，但對省黨委領導者所養成的這種非布爾什維克的習性不進行反對。這樣便表明了他們是無原則性的人，是庸人，而非政治的活動家。

無原則性的工作人員，其結果往往是失掉獨立與自動性。追求物質享受的工作人員，把自己束縛起來，失掉了批評別人的可能性。庫爾罕省黨委的委員們在對省委書記的關係上表現了無原則性，就因為他們中間有一些人，按着沙拉波夫同志的提議，幾度獲得了獎金。這也是他們彼此互相原諒錯誤的原因之一。

無原則性、庸俗化，也常常是不遵守布爾什維克原則挑選與分配幹部的結果。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根據政治的標準來挑選幹部——就是說，要看該工作人員在政治上是否可靠的；也要根據業務的標準——就是說看他是否適於這樣一種具體工作。凡是違反這些原則的地方，凡是挑選幹部只根據家庭的、庸俗的、朋友的關係，不管他們政治上和業務上是否適當，那裏便要替吹拍逢迎與在工作中互相包庇缺點造成有利的條件。得到的不是在原則基礎上的領導核心，『不是負責的工作人員的領導集團，而是親近人們的小家庭，而是這樣一種組合，它的組員都力求和平共居，彼此不相得罪，家醜不可外揚，互相吹噓……』（斯大林）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談不到對工作人員的高度嚴肅性。在烏梁諾夫斯克有很多事實表現出了嚴重的缺點。比如，城市管理無人過問，居民們常常沒有燈光，自來水忽有忽無，滿街是髒東西。

●省委書記德林吉也夫同志對此熟視無睹，對於城市管理失職的罪人表現了自由主義的態度。這一切，正因為德林吉也夫從前曾在遠東工作，當時他便隨身把幾個對於他是「合適」的工作人員帶到烏梁諾夫斯克來，現在，他對於這些人的工作也未表現出足夠的客觀態度，而因為朋友關係對他們就百般的原諒了。

對幹部進行思想教育，這是我們當前的重大任務。新的幹部不斷地增長起來，必須以布爾什維克的傳統教育他們，發展其優良的性格與品質。高度的原則性與理論性，乃是列寧——斯大林式的工作人員之卓越的特點與最重要的品質。以原則性與克服困難的堅決性教育幹部，將會促進更加順利的實現新五年計劃的任務與在我們國家內建設共產主義的任務。

(譯自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真理報)

# 論忠誠與老實

斯列波夫  
齊生

譯作

忠誠老實——這是列寧、斯大林型的工作人員之確定不移的特點。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黨的與蘇維埃的幹部，要像列寧那樣忠誠與老實。布爾什維克在其工作中與生活中的每一舉措，均需培植與發展這種優良的品質。

要忠誠——這就是說：「要像伊里奇經常作的那樣，像每一個布爾什維克都應該作的那樣，將全部真情率直而老實地向黨坦白出來。」（斯大林）

黨對每個布爾什維克所要求的忠誠與老實，是在實際工作中來檢驗的。一個共產黨員不論其所處何種職位，他都應該有勇氣批判地估價自己的活動，說出自己活動的真情。在政治上的忠實，完全要由「言行一致」（列寧）來檢驗。由此，就產生了一個最重要的布爾什維克的原則——不是按照人們的言詞、諾言、報告來評判人；而是按照人們的行為來評判人。

布爾什維克的話——是固定不移的話。領導者、公務人員是不能隨便說話的；話既說出，那就要表現決心毅力，並執行自己的諾言。如果你因為什麼原故盤算錯了，力不能勝——那你就老老實實說出這一點。否則你就是以饒舌者和騙子的可恥角色來談話。

列寧說：當一個人「言行不一致時，這就完全糟了，這會導向偽善」。

自然，當說到以忠誠的精神來教育幹部的時候，這就不僅是指這個字在普通意義上的忠實，而且也是指善於在每一件（即令是最小的）事情，從整個國家的利益，從黨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地方的，尤其不是從純粹私人的。

布爾什維克黨——蘇維埃人民的先鋒隊，蘇維埃人民偉大的創造性勞動之領導者——是以國家的全民的利益之深刻意識的精神來教育勞動者的；這尤其指的是負責領導的幹部。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與實際證明，我們的幹部是如何深刻地了解整個國家的利益，他們如何不可調和地對待各種反國家利益的現象；這在蘇維埃群眾完成着的成千愛國事件的例子上就可以看出。

同時也有這樣的情形，有時某些工作人員將國家的利益置於腦後，爲了取得獎賞或隱瞞缺點，這樣的工作人員就粉飾真情實況，走上了哄騙國家，欺詐和捏造的邪路，而故意的提出不合實情的關於執行國家計劃的報告。

由某伊凡諾夫負責的建設局的領導者們，在好幾年中提出的關於建設情形的報告，都是假的。按照這些報告，有一百三十件計劃「卓越地」和「很好地」建設好了。其實，其中六十五件是不完全的和不適於經營的。爲了這些誇張的數字，建設局在兩年過程中，得到了兩百萬盧布的獎金；其中伊凡諾夫個人就得到了十萬零三千盧布。奧姆斯克州黨委會和中央建設局的領導者們，沒有即時注意這些欺詐和捏造，而是很久以後才把牠們揭發出來。雖然類似的情況爲數不多，黨的組織仍不能無視這些情況。事業的利益和幹部的教育，要求黨的組織不能無視任何一件非法的事，而是有責任給牠們以反擊，以忠誠的老實的對待國家利益的態度來教育工作人員。

無須証明；及時揭露缺點是較易消除的，當人們不及時地講出真情，隱藏缺點，而最後使工作中的失敗暴露出來的時候——那時要糾正，形勢就非常困難了。由此可見，工作人員是應該有勇氣講出真情，不粉飾現實，指出事情的實際狀況，及時地揭露缺點，並指出其根源。黨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不應該將地方的利益提得過高，而應該切實地反映本區的企業的集體農場的情況。我們每個工作人員的本份，不要將被曲解了的個人威信高於一切。

對國家的不真實、常常表現在不願意肩負緊張的但是完全可能完成的計劃；表現在企圖以各種藉口逃避計劃的執行；表現在極力想得到其實沒有也可以的國家的補充資材。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者，無須外界之督促，也無須訴苦，就盡力超過國家所予的任務，去尋求新的儲藏，俾使其熔於總的國家洪爐中。一心為國家的人民的利益服務。

來自上級的最詳細的計劃及正確的指示，是不能夠預先估計到當地所有的全部可能性的。如果在工作的過程中發現了新的儲藏，布爾什維克不能也不應該將他們隱藏起來。他對誰隱藏牠們呢？對自己的政府嗎？對自己的黨嗎？隱藏儲藏只能是這樣一些人的事，這些人將其衙門的鐘樓看得高過國家的黨的利益。

這些允許自己對國家要狡猾的人們，是容易屈服於落後的傾向的。他們對橫在我們路上的困難，時刻準備加以誇大，又常常沒有表現勇氣與決心的魄力，希望不負責，把自己的責任推給別人——這是對國家完成業務的不真實態度的表現之一。害怕負責並按照「不要出了什麼岔子」的原則去作事的膽怯鬼，是沒有能力將事情推向前進、改善它、並表現創造，與主動性的。

以忠誠與老實的精神教育幹部，這就是要以工作人員自己的錯誤與缺點來教育他們，這是斯大林對布爾什維克幹部教育的珍言之二。

斯大林教導說：

『布爾什維克的責任，就是不掩蓋自己的錯誤，不逃避有關自己錯誤的問題（像我們常常發生的那樣）；而是老實而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錯誤，老實而公開的謀求糾正這些錯誤的方法，老實而公開的糾正自己的錯誤。』

有這樣的事實，某些工作人員逃避承認自己的錯誤，以為承認錯誤有傷工作人員的名譽，會有損其威信，這是對威信的不正確而虛偽的了解。實際上，承認自己的錯誤，準備糾正錯誤，是不會損傷工作人員的威信，反而會提高其威信的。必須記住列寧的金玉之言：聰明的不是那些不犯錯誤的人；而是那些犯了錯誤而不很嚴重，並善於敏捷而迅速的糾正錯誤的人。

費力克斯·特捷仁斯基說：

『會失去聲望的只是那種隱藏自己的缺點，不願意同醜惡鬥爭的人；也就是那種本應失去聲望的人。必須學會正視真理，並從群眾及一切參加生產的人們那裏去把握真理。再沒有什麼比自吹自擂與自滿更壞的了。只有當你一步一步地搜索醜惡並征服它的時候，你才能够前進。』

批評與自我批評，乃是在精神上教育幹部忠誠與老實的最重要的方法；用平常的格言『家醜不可外揚』來進行領導是不可能的。

在黨選擇幹部的原則遭受破壞的地方，是最容易發生這種類似的非布爾什維克的風習；難接

受了不許可的選擇幹部的的方法，誰就造成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負責工作人員的領導集體被排斥了，而代替它的却是盡力和平共處而不相互批評的親人、小家族、行幫。在這種土壤上，就繁殖着庸俗的劣根性，而有時就產生對國家利益的不誠實態度。

批評與自我批評，可以使缺點適時的揭發出來。錯誤如不隨時予以糾正，即會滋生新的錯誤，並最後毀滅工作人員。下面就是一個可作教訓的例子：

安得列夫同志最近四年間，在薩拉托夫城市蘇維埃執委會擔任第一副主席。還在他擔任這一工作的開始，他就犯了一系列嚴重的錯誤。黨的市委會與州委會接到了很多對安得列夫同志行爲的控訴，但是他們並沒有及時向他指出錯誤。他自高自大，而且自詡爲沒有錯誤的。安得列夫濫用職權，蔑視蘇維埃其他委員的權力，擅自取消區蘇維埃的決定，並脫離群眾。在一次州委會的集會上，他聲明說：『我有很多比接見勞動者更嚴重的事情，我沒有時間傾聽控訴。』

雖然這一切對安得列夫都是可以避免的，他却終於被撤職了。如果人們及時的向安得列夫同志指出他的錯誤，而不是由於朋友的關係，掩蓋了這些錯誤，那麼可能他還會作爲一個工作人員而被保留。

憐惜「幹部的自尊心」，認爲這對於他們就是作了有益的事，是不對的。沒有比這種觀點更錯誤的了。以掩蓋幹部的錯誤，來憐惜和保存幹部，等於實實在在的毀滅這些幹部。勇敢的澈底的和客觀的批評——這是教育幹部的基本方法，這種批評會幫助成全幹部、刺激前進、克服困難。



基洛夫說：

「我們的布爾什維克的實踐，從來沒有過於平穩的關係，我們是會激怒……：……：我們中間誰要是以這種或那種考慮，認為算了吧，說了不好，我還是最好不說，不去批評，那誰就要成爲罪人。應該老老實實的按着布爾什維克的方法，直視同志的共產黨員的眼睛，向他說：「你，親愛的人，你被絆倒了，纏住了；如果你自己不能起來，我就來幫助你；如果拉住手也不能拉起你，我就來拉你的頭髮；我要盡一切可能糾正你。但如果你，親愛的人，不糾正過來，那麼你就責罵自己吧，你得滾到旁邊去！」」

以忠誠的精神教育工作人員，沒有日常的嚴格的監督，對執行沒有完善而熟練的有組織的檢查，是不可能的。黨的組織同工作人員的關係，不能建立在盲目的信任上。黨的領導和監督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認出工作中的缺點，很快的提出方法糾正它。沒有執行完善而熟練地加以組織的檢查，就不可能保證適時地揭發缺點，並以忠誠與老實的精神，以布爾什維克對所負責任之責任心的精神，教育工作人員。如果工作人員知道監督是實實在在的，誰也不能將破壞指示的事馬虎混過，而不爲人所知——那麼僅此即足以使他緊張起來。

爲了勝利的完成前後五年計劃的任務，黨的組織在工作上就更嚴格，就更要培養工作人員那種對國家，對人民的崇高的責任感，對於一個布爾什維克國家的全民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布爾維什克的天職，就是隨時隨地小心地保護自己的榮譽與美德，因爲這是列寧、斯大林的偉大政黨的榮譽與美德。在全體蘇維埃人民的眼中，一個黨員應該在一切事情上是先進的人，其德性引起

普遍的崇敬與倣效之心的人。

(譯自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真理報)

# 論對缺點的不調和性及

## 布爾什維克的嚴肅性

斯列波夫 作

蘇 瑛 譯

共產黨是反對停滯不進及保守主義的死敵，從來不滿足於已獲得的成績，而總是向前看。從我黨的本質及其革命的精神中產生了對缺點的布爾什維克的不調和性。「對本身缺點無情的揭露，是一切生動活潑的政黨所必需的。沒有比自滿的樂天主義再壞的事了」（列寧全集第七卷三百零七頁）。

驕傲，自負，泰然自若和布爾什維克黨人是沒有因緣的。列寧和斯大林責叱這樣一些工作人員，對他們來說，只要在某些成績就足以使他們苟安自滿，而忘記缺點。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這部分人說「只要有兩三個大的成績就已目空一切，要再有兩三個大的成績，就驕傲起來百事不在乎了。」

對缺點表現布爾什維克的不能容忍態度，這就是說，不因勝利而衝暈頭腦，不因即使是很小的誘惑而鬆懈工作，清楚地看見尚未解決的問題，要正視錯誤。

大家知道，如果不讓缺點發展下去，那它是比較容易改掉的。錯誤經常是從很小開始，可是

當它不被人所注意的時候，它就被展成大的錯誤。『所有的人都可能害瘡，但假如這個瘡開始腐爛時，就可能變成不治之症』（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九十九頁）。我們應該培養自己最寶貴的品質——當缺點剛一發生的時候，就要善於看出，揭穿，並預防它。因此，有些個別的作人員，害怕對自己不如意，而杜撰各種辯詞來掩蓋或者迴避缺點，以『故作清白』，這是不可容忍的事。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不能以個人利益或者暫時利益的觀點去對待事物，他應該永遠站在國家利益之上，客觀地估計工作中的優點和缺點。

不隱瞞缺點——這是對領導者不變的要求，但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而重要的是善於誠心誠意地揭發產生缺點的根源及找到糾正缺點的方法。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不能夠逃避責任，不能困難面前低頭——他必須傾其全力來克服它。假如工作人員只知道悲嘆困難，而不真正的同困難作鬥爭，那有什麼用處呢？！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表現在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上。如不公開批評並分析缺點，那怎麼叫做揭發缺點呢？批評及自我批評，是我黨所掌握的真正動力和強大武器。

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是暴露和糾正領導方面錯誤的方法，是正確教育幹部的基本方法。我們需要自我批評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斯大林同志說：『我認爲要沒有自我批評，我們黨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揭露我們的瘡痕，就不能消滅我們的缺點。』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這就是說，領導者應該是在工作中很嚴肅，不是馬馬虎虎，不是以家庭親友的方式決定問題，而是有高度的嚴肅性，這才能及時揭露缺點，找到糾正缺點的途徑，正確

## 地教育幹部。

真正的嚴肅精神，不容因「職位」和「功勳」而有所遷就。它應該同樣適用於好的和不好的工作人員。可惜，並不經常是這樣的。有人常常認為：這種嚴肅精神只拿去對待不好的工作人員，把它看成是領導者手中的特種鞭子，專為對付懶散的人使用的。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它有害於工作及幹部教育。拿這樣的事實作例吧：就以阿赤金同志所領導的薩拉多夫省「新布拉斯」機器拖拉機站，在很長時間中都被認為是先進的站。該站一切工作都作得挺好，它底領導者受到無限的讚揚，但沒有指出他們工作中的缺點。因此阿赤金同志也覺得自己真正是十全十美的人了，而且滿足起來了。到收割莊稼的時候，他說道：「我們沒有什麼可着急的，反正我們先收割完。」一樣鬆懈的結果，使得該站很遲的才開始收割運動。而結果怎樣呢？結果阿赤金同志所領導的機器拖拉機站在收割方面落後了，並拖晚了被它供給拖拉機的各集體農場的收割。

就很好的工作人員，也不保險不犯錯誤，沒有缺點，要是缺乏這種嚴肅性，就是好的工作人員，對待自己工作也沒有批評的精神了。

布爾什維克的嚴肅性，就是說要根據人們工作的效果來審查他們，這種審查，不是根據某種片斷的「突出一工作，而是根據經常的工作。不斷的對執行指令指示加以監督，能培養工作人員的準確性及嚴肅性。不管你說了多少關於紀律的必要及好處，而作出的決議很快被忘記的話，那就廢弛紀律，發生散漫，結果責任心就一定喪失。

要有嚴肅性，這就是說要同樣地組織領導，使得任何破壞黨的指令的行為不能不受到追究。

在這一方面，起着很大作用的不僅是自上而下的審查，單單這樣還不够。斯大林同志會指出自下而上進行審查的重要性，即被領導者審查領導者，揭發他們底錯誤，指出糾正這些錯誤的辦法。黨員群眾在積極分子會議上，在代表會議上，來審查自己底領導者的方法，就是聽取他們總結報告，批評他們的缺點，選舉或不選舉他們到領導機關去。沒有這樣的審查，就不能夠用對錯誤和缺點的不調和精神來正確地教育幹部。

工作的嚴肅性和官僚管理——粗暴的叱責，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官僚管理是一種無知的產物，是缺乏領導的結果。不會研究事物底本質，不會正確的配備幹部，企圖個人獨斷一切，不吸懂事的人參加，不研究群眾的經驗，不考慮黨工作人員集體的意見的地方，就有這樣的現象。

官僚管理，就是說命令和領導不依靠積極分子，而領導的任務恰在於團結積極分子。需要組織各種不同部門工作人員的配合行動，以便『推進工作，不是各自為政，各幹各的，而是應該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因而獲得成功的最大保證』。（日丹諾夫語）

伴隨官僚管理而來的，照例是時常調換幹部，殊不知處理幹部的組織工作本身，就包涵有教育的成份。好的領導，首先是教育和訓練幹部，並給他們以實際的幫助。當然，處罰也有其教育意義，但要是濫用處罰，就不成其為教育的方法，因為幹部會對處罰不在乎了。

也有這樣的情況，需要堅決的處置時，而領導人却去進行勸說，看到工作人員有過失時，領導者却猶豫不決以自由主義的態度代替了處罰。

就拿蘇共（布）烏得幕爾省委的事實作例子：在這裏，沒有對待工作人員的嚴肅性。巴塔葉爾領導的建築設計拖拉斯，他本人行為不正，欺瞞上級，而省委不去揭露這種工作人員，反而包庇他，掩護他去損害我們事業。而且這樣的事實不是個別的現象。這不是鞏固紀律，而是使幹部教育受到嚴重的損失。

正確的教育幹部，並不是用私人朋友關係來團結他們，掩蓋他們的缺點，姑惜他們的自尊心。黨的工作人員應該對自己有一基本的訓誡——不要姑惜個別的人員，不管他們有多麼高的職位，只是要尊重事業，尊重事業的利益。斯大林同志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在某些個別的情況下，領導工作者害怕別人責備他為官僚管理，不敢嚴格的要求執行黨的指令。責難嚴肅性是多餘的，這只可能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只想輕鬆的生活，並在取得第一個成績之後，就昂頭天外，自滿自慰。假如一個領導者他是為事業的利益而行動，他努力工作，他可以要求別人和他一樣，那麼，這種嚴肅性對他有什麼不好呢？

對缺點的嚴肅性及不調和性，只有那些真正不受官廳習氣影響的領導人，才是可能的。在工作中沒有原則性，對自己行為不約束的工作人員，就使自己同那些阿諛奉承不正派的人同流合污了。這樣的工作人員在同缺點和罪過作鬥爭中表現了束手無策。這裡，相互包庇及溫情主義的風氣就代替了原則性和嚴肅性。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像溫情主義及互相包庇這種非布爾什維克的習氣，會發生多大的害處，最後這些東西必至引向相互原諒錯誤。他說：「譬如說，某個組織的高級領導者張三，犯了很大的

錯誤，並且把事情搞糟了。但是李四不願意批評他，不願意揭露和糾正他的錯誤。不願批評，是因為不願意「給自己樹立敵人」。犯了錯誤，壞了事情，這有什麼要緊？！我們大家誰能不犯錯誤呢？今天我原諒了他——張三，明天他就能原諒我——李四。因為怎麼能保險我不犯錯誤呢？大家客客氣氣和平相處多好哇。讓錯誤放過去，這就損害了我們的偉大事業嗎？沒有什麼！反正對付過去就行。同志們！這是我們某些負責同志常有的議論。但這有什麼意思呢？我們布爾什維克是批評整個世界的人，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翻天覆地的人，假如我們爲了使某些同志不麻煩而放棄自我批評，這除了傾覆我們的偉大事業而外，就不會有另外的結果，難道這還不明顯嗎？」

什麼地方家庭式的解決問題佔了上風，那裡就沒有嚴肅性，那裡就容忍缺點和錯誤，甚至常常容忍罪過。

我們舉這樣一個例子吧。不久前，吉爾契支盟員共和國的國家監察機關，在查該共和國農業供給處的工作時，發現了亂分缺貨、私自供給、違犯財政紀律的事實，而該供給處把所規定對於機器拖拉機站、修理工廠、作坊、集體農莊供給機器及機器零件的工作做的很不好。吉爾契支共和國農業部的領導人，明知供給處工作做得很不好，而却自由主義地對待他底某些工作人員，沒有指出他們這種活動的重大損害，沒有表現必須的嚴肅性。如果問，這是爲什麼呢？就是因爲該農業部的領導者本身有時也參加了這種非法的行爲。他們不按規定，比如把配給機器拖拉機站，農業技術學校，及普通學校的很大數量的布疋浪費了，而且把一部分分給了農業部及供給處的工作人員了。還亂分了其他的物品，很大一部分已經發到供給處的分解機（製奶油用的）沒有給



集體農莊的牧畜部，却落到私人的手裡去了。

由於這些原故，該部的領導者在某種程度上就和下級供給處的工作人員有了牽扯，而在同他們工作中的嚴重缺點作鬥爭中就失去了武器。這一點說明了，同自己監督下的人員的互相關係，領導者思想上的純潔是如何重要啊！

黨的工作人員是給各個工作部門的幹部在工作上指示方向的。斯大林同志關於蘇維埃的黨的監察人員說過的話，對於黨的工作人員比對任何其他的人員更為重要。斯大林同志說：「他們應該純潔無瑕，追求真理，以求他們不僅能夠有形式上的權威，而且要有思想上的權威來審查和教育別人。」

思想教育教育幹部在工作中的嚴肅性及對缺點之不調和性的最重要條件。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能夠深刻了解黨的政策，而因此提高每個工作人員的責任心和對國家義務的感覺。只有自覺的和思想鍛鍊的人才能明白自己對黨的義務，明白自己對黨所負的責任。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高度的嚴肅性，過去會是，現在也還是正確教育幹部的基礎。

（譯自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真理報）

## 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

### 布爾什維克高貴的品質

多爾庫諾夫

我們生活和工作在無階級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完成，以及由社會主義逐漸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代。爲更加光明的將來的前途所鼓舞着的我國勞動者們，表現了極大的主動性，及日益不斷增長着的政治的和生產的積極性。這種積極性在斯塔漢諾夫運動底更高的形式中，在工業和農業各部門無數革新者底生產業績中，在蘇聯學者、文藝工作者底成就裏，都得到了自己底表現。蘇聯人民底多方面的才能是日益廣泛地展開了，因爲蘇維埃制度給我國人民底發展及創造勇氣以無限的可能。

我們底黨，是革新者的黨，革命者底黨，這個黨敢於推翻陳舊的標準，而接受新鮮和前進的事物。

顯然，一種新鮮的事物，在生活中被接受，並不是自流地、自發地，而是在緊張的、不斷的鬥爭中形成的。扶植一種新鮮的事物，以一切力量鼓舞它，給與它以一切生長和形成的條件，這便使每一個布爾什維克底義務，尤其是每一個黨底領導人底義務。

斯大林同志把對新鮮事物的感覺，稱之為每一個布爾什維克工作人員底高貴品質。然而掌握這種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什麼意思呢？這首先就是說要善於看到未來，不是墨守成規，而是依靠那種雖然幼小，但却在上升着的事物，這就是說，不要滿足於已經獲得的東西，而是不斷地向前進步。

有許多黨底領導人總是抱怨說：日常工作佔去了他們底全部時間，這就使他們沒有可能深思熟慮地去考慮本區、本省底發展前途問題。在大多數的情形下，這種現象發生在這樣一些人們的身上，他們企圖把一切事情都自己親手去做。他們不善於配合那些在他們負責領導下的各個不同的工作部門的工作。黨的工作人員，不應該包辦一切，代替一切。他是一個政治領導者，他底責任在於把黨的、蘇維埃的、經濟等各機關的一切力量推動起來，給以需要的方向，並督促他們能在實踐中堅決地執行決定。只有這時，一個黨的領導人才能從瑣碎的、次要的工作中解放出來，而集中精力在那些主要的，決定本區或本省未來發展的工作之上，深思熟慮這些發展前程，去利用經濟上的可能性。

在這方面，一個區或一個省的計劃問題有着重要的意義。要製定計劃，不單是只照顧到今天的事務，而且要看明天。這就是說，在每一區的經濟發展上要執行一定的政策。計劃就是這種經濟政策的表現。那些全心全力去搞各區發展前途的黨的區委和省委，他們就是做得對了。

例如，去年聯共黨莫洛托夫省省委，召開了一個討論發展本省生產力問題的科學代表會議，全國著名的學者都參加了這次會議。莫洛托夫省有什麼天然寶藏可以開發？那些工廠必需首先建

立起來？工程師和技術員應該按着什麼方向進行工作？諸如此類以及許許多多其它的問題，該省的工作人員都得到了必要的答覆。正因如此，黨的領導人才能够在自己面前，提出具體的任務，推動黨的和財務的機關去解決最急迫的問題。

向前看，這就是說，對自己已經做過的東西給以估價，但並不是把宅當做固定的總結，而是把宅當做向前推進運動的出發點。有些領導人，當他們給某一運動做總結時，總是忘記事情底這一重要方面。他們通常只是把積極和消極的現象加以羅列，痛罵缺點，提出許許多多的數目字。在這裏便忘記了關於新鮮事物底生動活潑的例子，這樣的例子在任何一件大事中都有。而發揚這種新鮮事物，澈底分析宅底產生條件，把社會輿論的注意力集中在宅身上，這就是爲更形加速的，前進的運動向新的勝利之發展，建立了補充的源泉。

自然，當一個新的事物在宅開始發生時，是不容易觀察出它底萌芽的。列寧在他底「偉大的開端」一文中寫道：「當一個新鮮的事物剛剛出生時，舊的總是存留下來，在某些時間內，還比新生的強大，這在自然界中和社會生活中總是如此……我們必需仔細地研究新生底萌芽，極其關懷地去對待它，用一切方法幫助宅底生長，並「扶育」這些幼小的萌芽。」

爲了及時發現新鮮的事物，爲其迅速的生長奠下基礎，就必需具有敏銳的感覺。有時，某一件事情，在我們按其長處給以估價之前，常是經過巨大的誕生的痛苦的。那些懼怕份外的操勞和努力，慣於和平，按照舊秩序生活的人們，靠得住就是漠不關心新鮮事物的罪人。很自然的，這樣的工作人員對於新鮮事物的感覺是遲鈍的，他們是更多地傾向於陳舊的東西，他們早晚有

變成墨守成規的人，保守主義者的危險。

就拿砂糖工業管理總局的工作人員做例子吧。他們成年成歲地把許許多多的寶貴建議擱置起來，而這些建議如果實現的話，就能額外地給國家以幾千普特砂糖及節省千百萬盧布的開支。而在砂糖工業管理總局裏，把狹隘的本位的利益置於全國利益之上，他們不但不支持這種寶貴的倡導，而且相反地，去阻礙它們。甚至於在蘇聯輿論界發表了尖銳的批評之後，在砂糖工業管理總局裏仍然繼續存在着對待新發明拖匪不用的現象。可以設想，在這些地方墨守成規及保守主義是多麼根深蒂固。而這是爲什麼呢？這就是因爲砂糖工業管理總局的做領導工作的人員，脫離了實際生活，失去了對新鮮事物的感覺。

工作經驗，與群眾的連繫，善於從國家底要求出發去對待每一件事情，這些東西便給一個工作人員以對新鮮事物的敏銳的感覺。幾年以前，庫爾斯克省的幾個集體農莊開始採用了勞動組織之小組制。當時省委領導人常常到各區裏去，仔細傾聽集體農民的意見和他們底提議。省委決定把這些零零碎碎的經驗普遍化起來，而且決定這個工作必須由省裏來做，因爲省和所有的區，所有的經濟的，蘇維埃的，黨的組織連繫着，因爲正是在省委手裏牽着主要的領導線索。

省委當時就全心全力地研究了勞動組織的小組制。在集體農莊內給每一小隊固定了經常由他們耕種的土地，農具和牲畜。給各小組固定了由他們管理的作物：栽植作物，技術作物，菜蔬，有些還規定了種植穀類作物。勞動償付中的平均主義被消滅了，收入按每一小組所獲得的收成進行分配：獲得較高收成的集體農民小組，得到較高的報酬，而獲得較低收成的小組，則得到較低

的報酬。

在研究勞動組織小組制的時候，集體農莊農民的經驗又被黨的領導人底政治經驗所支持並被導入了正確的道路。從一開頭，省委就了解不但有必要用一切方法促成新鮮事物的產生，而且要幫助它形成，生長和鞏固。省委不止一次地寫信給集體農莊主席們，集體農莊黨的書記們，村鄉地方黨的組織，小隊長們，告訴他們如何正確地組織勞動，如何採取按件工資制，如何分配收入，並如何去廢除非個人負責制及平均主義。

很可惜，並不是到處都能很注意地傾聽群眾的呼聲，並把群眾的經驗普遍化起來。有時便只局限於去寫些鼓勵個別斯塔漢諾夫式工作者及個別單位的決定和指令，形式地給自己保了一險，以求避免受到工作不活躍的責備，但實際上對於採用和鞏固新生事物方面，並沒有做任何工作。這種對待工作的態度，不能發揚主動性，而只會停滯它，絞殺它。

我們黨的組織，在深入的利用斯塔漢諾夫運動前進形式及新的工作方式等方面，已經積蓄了巨大的經驗。這些經驗告訴了我們什麼呢？它告訴我們說，必須每天都去幫助那些採用新的勞動方法的人，給他們掃清被墨守成規，保守主義所阻塞了的道路。但是，只去幫助一二個斯塔漢諾夫式工作者還是不夠的。前進者底經驗必須為全體工人所享有，只有這樣，這種經驗才能獲得全民的意義。雖然如此，然而收集斯塔漢諾夫運動的經驗，把這些經驗普遍化，加以傳播，遠非所有的地方都做到了應有的程度。一般來說，這些進步的經驗，很快就被頌揚一番，然而並不是都能找得到其中細膩的，科學技術的根據，而這種根據恰恰能夠成爲生產中的工作方法和規範。

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從黨的工作本身發生的，黨的工作就是在共產主義的建設中國結勞動者爲着新的勝利而進行鬥爭。黨的活動是不能容忍定型和停滯的。創造的熱情在一個黨的工作人員來說，是固有的：他批判地估價自己底經驗，經常地檢查自己底經驗是否適合於新的任務和要求。一個具有對新鮮事物感覺之黨的工作人員，從來不漠視別人底經驗，並不以學習和掌握別人底經驗爲可恥。有些所謂「絕無奇處」的工作人員，他們認爲自己沒有什麼可以向別人學習，也沒有誰值得他去學，他們把自己底眼界只局限於個人的經驗之內，把自己封鎖在自己底有限的學識的圈子裏，於是他們就老是僵在一個地方了。

當一個工作人員不斷地去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的時候，這種對新鮮事物的感覺就日益鋒利和敏銳。馬列主義能幫助我們認識在胚胎中的新生事物之萌芽，並按其長處去估價它們。這種感覺是由永遠生動活潑的，永遠發展着的馬列主義本身產生出來的。馬列主義教導我們說，在新鮮的和陳舊的，垂死的和新生的，衰老的和發展的之間的鬥爭，就組成發展過程的內容。研究馬克思主義，一個布爾什維克就能深刻地認識黨底要求，黨底領袖列寧和斯大林底要求，就是要求我們注視生活中出現的新生的事物，就是要求我們不去依據那些陳舊、衰老的，而是依靠年青的，發展着的事物。學習馬列主義的意義，對幹部底實際活動來說，是無法估價的。馬列主義的理論，用預見和辯認前進事物的能力，以及爲其形成和生長創造一切條件之能力武裝着布爾什維克。

在我們底社會裏，正在進行着新鮮事物之誕生，及其與舊的事物鬥爭之不斷的，群眾性的過程。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摧毀衰老、落後事物的方法，就是爲培養新生、前進事物而鬥爭的方法。

。斯大林說：「沒有批評就不能前進，這個真理是純潔的，明澈的，有如泉水那樣純潔，明澈。一展開對落後的批評，責備墨守成規的分子，布爾什維克就是給新生事物及其鞏固肅清道路。」

戰事結束以後，在黨的面前，出現了新的任務。蘇聯人民正全心全意努力為祖國做他們力所能及的一切。他們每天都給自己底勞動方法帶來新的東西，這些新的東西使我們能更迅速，更有信心，更順利的向前進步。及時地發現這些新鮮的東西，維護它，使它能廣泛地傳播開來，任何時候也不滿足於自己底創造，鼓勵群衆的創造熱情，這就是每一個黨的領導人，每一個布爾什維克之最崇高，最光榮的任務。

(洵譯自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報)